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0年第3期

总第15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基地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工作简讯

-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李浩教授参加省发改委黄河文化论坛 / 12
-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团赴陕西延安、榆林调研 / 13
- 中心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专家审稿会议 / 14
- 中心李浩主任一行赴陕文投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 15
- 省决咨委课题组赴西安演艺集团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 16

◆专家观点

- 李芳民 李白暮年身世经历之自我记忆重构考论 / 17
- 陈洪海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的葬式分析 / 16
- 何寄澎 《摩石录》序一 / 30
- 陈尚君 《摩石录》序二 / 31
- 李 浩 《摩石录》后记 / 34

◆学术平台巡礼

-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 / 36

◆学者风采

- 当代佛教专家——李利安 / 39
- 唐代文学专家——李芳民 / 41

◆新书推介

-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 43
- 《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八辑 / 44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 江

主编

李 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 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 晓

吴红兵

封面题字

袁行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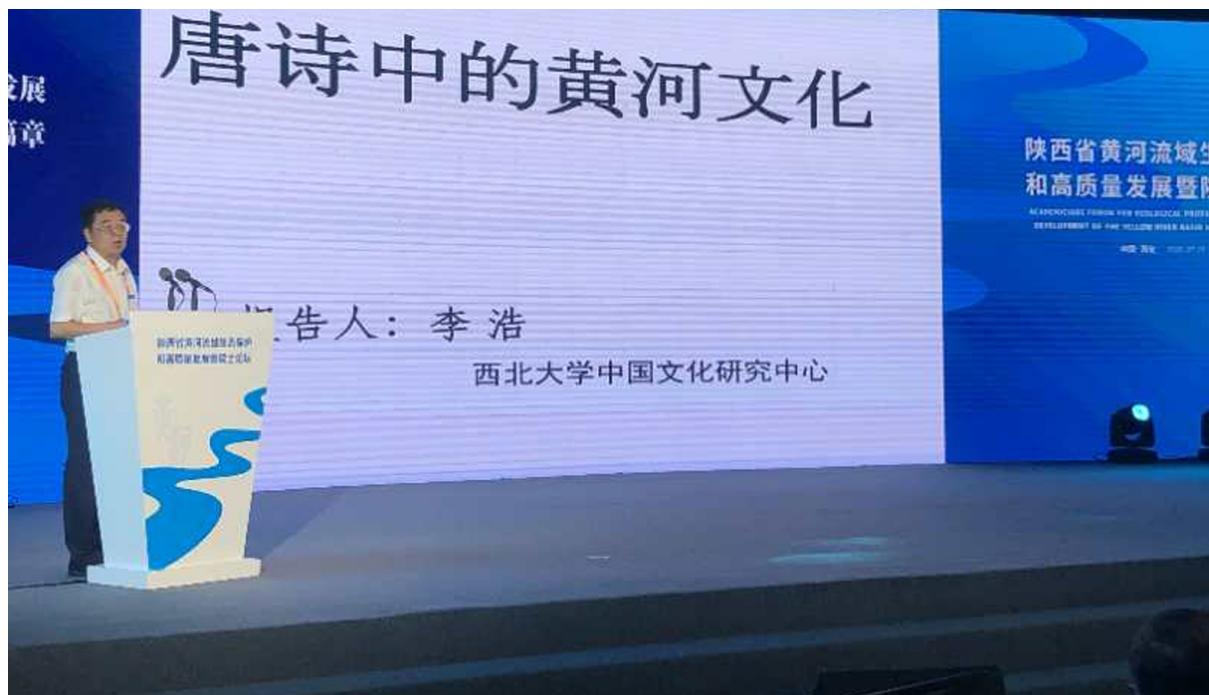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李浩教授参加 省发改委黄河文化论坛

2020年7月29日,由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院士论坛”在西安举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浩教授在论坛中作专题报告——“唐诗中的黄河文化”。李浩在报告中提出:黄河滋养中华儿女,孕育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唐诗中保留了丰富的书写黄河的作品,展现了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是研究黄河文化的重要资料。研究唐诗中的黄河书写是当代保护、弘扬、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的重要路径。

报告具体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唐诗中存

有丰富的黄河文化内容,包括黄河水文生态文化、河湟和战史料、借黄河抒发丰富情感和以海晏河清象征圣贤治世的理想。第二,唐诗黄河书写取得了高超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黄河书写能够摄取黄河全息图像、创新运用古代历史典故与神话故事、构建雄浑空灵的美学境界。第三,唐诗黄河书写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就此找寻民族文化的根与魂;追忆黄河治水的历史智慧;学习优秀作品的典雅汉语;建构坚毅不拔的黄河精神。

报告还指出,唐诗中吟咏黄河的经典之作对于当下研究黄河文化的发掘总结、丝路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对照等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值得学界进行深入而广泛地探讨。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团赴陕西延安、榆林调研

2020年8月4日-7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副主任赵杭、文学院段建军教授、新闻学院王春泉教授、经管学院岳宏志教授,陕西科技大学金鑫副教授,西北大学陈战峰副教授、王早娟副教授,吴红兵、刘晓、郭琳博士等一行人,就2020年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重大课题“如何将陕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赴延安、榆林进行调研。

调研组在延安参观了枣园、延安1938文化街区、金延安等革命文化胜地、红色旅游景区,并与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各部门向调研组介绍了延安文化产业现存的问题、延安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延安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效应等情况,调研组得以深入了解延安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黄土风情文化及其转化升级的模式和经验。

在榆林,调研组深入考察了榆阳区夫子庙文

化旅游街区“五馆一中心”,包括陕北民俗博物馆、陕北红色藏品陈列馆、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走出家乡的榆林人展览馆、丝路脱模泥塑艺术馆和榆阳区文化艺术中心。“五馆一中心”的建立,是榆阳区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深度融合、同步繁荣的重大举措,提炼抽取最具特色的陕北民俗,从而不断延伸和拓展陕北文化内涵,带动文化产业发展。调研组与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进行了座谈,深入了解榆阳文化文物旅游资源基本情况,近年来榆阳区发展文化旅游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深化“文旅融合”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此次延安、榆林调研之行,调研组深入了解陕西的文化资源优势和文化产业发展,延安的红色旅游、榆林的陕北风情文化,都给调研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为研究陕西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了蓝本和范式。



中心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专家审稿会议

2020年8月28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西安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专家审稿会议。会议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淑萍教授和西北大学文学院赵小刚教授、郝润华教授、张文利教授等专家出席会议。中心副主任赵杭、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心的多位老师参加会议。

首先,李浩主任发表讲话,介绍了《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工作的相关背景,指出了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黄帝祭文集考释》编辑工作组孟飞博士介绍了写作和编辑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文

稿的体例、工作进度、任务分工以及编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之处作了汇报。随后,参与此次审稿工作的诸位专家,首先肯定了文稿编辑的重要价值,之后分别就编纂体例、资料收集、编纂内容、改进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最后由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作会议总结,要求大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认真吸收专家组的修改建议,对文稿的注释、考辨再做修改,同时兼顾文化普及的目的,将文稿文字的难易度进行调整,并要求编辑组充分利用此次《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机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心李浩主任一行赴陕文投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020年9月3日上午，中心承担省决咨委有关文化发展课题组团队李浩主任、赵杭副主任，中心成员王早娟、吴红兵、郭琳，以及我校新闻学院王春泉教授、文学院张阿利教授、经管学院岳宏志教授等人在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白阿莹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理的带领下，赴陕文投集团，就促进我省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优势进行实地调研座谈。

调研团首先对陕文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文化旅游景区展示屏、书画艺术品展厅布展情况进行了考察。在随后的座谈会上，陕文投集团董事长王勇、总经理卢涛分别汇报陕文投发展情况、发展体会、未来规划和意见建议。

白阿莹对陕文投集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陕文投作为省属龙头文化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抢抓发展机遇，一直在大踏步前进。文投影视、文化旅游、文化金融三大主业形成全国品牌，塑造了一支优秀的文化产业发展队伍，成为我省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企业发展充满活力。他强调，陕文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面向“十四五”，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资本运营公司组建，盘活现有资源，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率，为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产，文化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邓理表示，陕文投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十年磨一剑，目前已经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省级文投、最具品牌价值的文化企业、最佳文化旅游投资机构，成绩鼓舞人心，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文化企业。他指出，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就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实施“文化+科技+金融”融合发展。他希望陕文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优势，推动全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课题组组长、中心主任李浩，课题组副组长、中心副主任赵杭及参与此次调研的其他成员，围绕着中心承担的2020年度省决咨委重大课题“如何将陕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中有关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内容与参与此次座谈的陕文投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思路，积累了资料。

省决咨委课题组 赴西安演艺集团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020年9月9日下午,中心李浩主任、赵杭副主任,中心成员王早娟、吴红兵,以及我校新闻学院王春泉教授、经管学院岳宏志教授在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白阿莹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理的带领下,赴西安演艺集团,就促进我省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优势进行实地调研座谈。

调研团首先参观了西演会客厅和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并观看了西安歌舞剧院舞剧《门》、西安市豫剧团音乐剧《花木兰》、豫剧《冤家聚头》等剧目排练。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西安演艺集团董事长寇雅玲详细介绍了西安演艺集团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果,就市场化探索方向上进行的文化产业尝试进行了汇报。她表示,集团领导班子正是在坚持政府引导下积极开展市场经营,才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并让我省文化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白阿莹提到,西安演艺集团是陕西文艺界中的一面旗帜,所坚持的创新型管理机制对于全省文艺院团的发展之路都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对于西演集团以一流标准引进艺术人才上所展现的远见卓识表示钦佩。并鼓励西安演艺集团以市场为根本,持续开展文旅融合的有益尝试,用“小投入”撬动“大产出”;抓住易俗社街区改造的有利契机,让现代化科技融入传统艺术;深挖掘剧目潜在文化价值;打造高水准演员的个人IP,推动造星计划。

课题组组长、中心主任李浩,课题组副组长、中心副主任赵杭及参与此次调研的其他成员,围绕着中心承担的2020年度省决咨委重大课题“如何将陕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优势”中的有关内容与参与此次座谈的西安演艺集团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案例材料。



李白暮年身世经历之自我记忆重构考论

——以《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相关记述的读解为中心

李芳民

内容摘要:李白暮年曾有《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诗,对其生平经历以往事追忆的方式做了较为完整的叙述。但诗中既有写实性的记述,也有出于某种原因的改写,其中围绕“幽州之行”与“从璘入幕”两大重要经历的叙述,即与其此前所作诗中的相关描写有所参差,这种前后诗作记述上的不一致,可看作是李白对其身世经历的自我记忆重构。他在诗中的记忆重构,既与两次重要经历所涉及的相关人物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其写作此诗特定的情境以及其本人暮年亟欲报效国家的热切企望有关。追寻诗中这种重构记忆的成因,对于正确评价李白的人格精神与人生追求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李白; 幽州之行; 从璘入幕; 记忆重构

肃宗乾元二年春末,李白在流放夜郎赴贬所途中于夔州奉节遇赦,旋即还江陵,嗣后东至江夏,《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简称《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即是年秋至江夏后所作。这首诗较特殊也很重要,就其大者而言,有两点特别显著:一是李白诗歌抒情色彩浓厚,偏于叙事者少,而此诗却以详述自我身世经历见长。二是这篇作品作于李白去世前三年,是其暮年的往事追忆,对于全面了解他的平生志趣与暮年心态颇有价值。但细读此诗则会发现,其中所述重要事件与李白此前诗歌中的相关记述有所参差。这种记述不一致的情形,是由于李白记忆上的前后模糊之误,还是其有意为之的记忆重构?笔者以为,弄清其原因对于认识李白之个性与品格极为重要。本文即以《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的相关记述为中心,着重围绕李白对两个重要事件的自我记忆展开讨论,分析李白长流遇赦归来时的

特殊情境、心态及其记忆重构的形成原因。

一、《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的叙事内容及其与相关诗之叙述参差问题

肃宗乾元二年秋李白至江夏后,与当地官员多有往还。《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所赠对象韦良宰,是其所交游的当地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他以地方最高长官兼旧友的身份,招待流贬归来的诗人,使李白颇多感慨与感动^①。在经历了因“附逆”系狱、雪枉释囚以及长流夜郎、半道遇赦的遭际后,或许深感于人生起落,李白自觉有必要对生平经历做一次总结,特别是对自己在相关重大事件中的活动与作为做出必要的说明,以消除时人乃至后世可能产生的误解与误会。这首诗作之所以会表现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面貌,原因或即在此。

《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是李白诗集中现存篇幅最长的作品,其内容又关涉李白一生行事与遭际,因此后世学者围绕诗中之主要关节亦多有

诠释。自明人朱谏《李诗选注》，下及当代朱金城与瞿蜕园之《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之《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郁贤皓之《李白全集校注》，皆于此诗分段论析，对所涉及之重要关节有较为详细的诠释。清代的《唐宋诗醇》中有评述云：

此篇历叙交游始末，而白生平踪迹略见于此。“十月到幽州”一段，盖白自被放后，北游燕赵，观听形势，知禄山之叛，尾大不掉之害，欲言不能，述之犹觉痛切。至于潼关失守，江陵煽乱，与白之为璘所胁，受累远谪，无不明如指掌。结尾一段，虑庙堂之无人，忧将帅之不一，而贼之不得速平，与前遥相照应。^[2]

其所瞩目者为从璘入幕、北上幽州与流贬放还后忧心国事三节，并据诗中所叙对李白之作为做了正面的积极评论。不过，考虑到此诗叙述李白身世经历的整体性，我们有必要对诗中叙事加以完整概括。纵观全诗，围绕李白身世与经历的叙说主要有五端：1.谪仙人身世与平生志向。2.名动天下、奉诏入京与怅然别离。3.北上幽州，知禄山之将反，叹报效之无门。4.李璘东巡，迫胁入幕；长流夜郎，负霜含冤。5.遇赦东还，再逢旧交；忧心时局，冀蒙见用。

当然，对以上五端，李白用笔之繁简、显隐当然有所不同。大致而言，第1至第4项为述往事，第5项为叙今情（当下事），其追述往事者中，第1、2项，时人对李白的体认与李白自己的叙写无大出入，可以看做是写实性的记述；第5项为当时情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虚构。惟有第3、4项，由于涉及诗人当代之重大而特殊的事件，且

事件之前后李白皆有相关作品存留，两相对读，其叙事之间未免有所参差与不合，从而引致人们的困惑乃至褒贬是非之论，而这似亦难以其记忆上的前后模糊之误而简单视之，故以下专就诗中所述“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二事展开论析。

二、“北上幽州”经历之记忆重构及其原因

李白的幽州之行，自天宝十载秋于开封渡河北上时计，至天宝十一载春返归梁园，前后历时约半年左右。这是自玄宗“赐金放还”后，李白希望在政治上重新振起而进行的又一次重要活动，也是李白一生经历中极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这次北上之行的最初动机及希望达到的目标，《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未曾叙及，只是记述了其至幽州后之所见，并预感安禄山将谋叛乱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与无奈。诗中于此是这样记述的：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驱马还贵乡。

对于这段描写，朱谏在《李诗选注》中有如此解说：“十月而至幽州，值禄山之谋叛，戈鋋森列犹如星罗，势甚可畏。夫禄山者，乃羯胡之小丑，天子授以三镇节度，委任非人，是乃朝廷自弃其北海之地，以范阳平卢河东幅员要害，而委于犬羊之手也。故彼得以逞危恃强，凭陵华夏，撼动山川，无敢御者。其包藏祸心，日已久矣。我虽知之，自分疏远，莫陈一语，将欲隐去，栖于蓬莱、瀛海之间，以避其乱，犹恐未能也。夫禄山者，乃天狼之妖星，天下之所共疾者。我欲弯弓以射之，挟矢在手，犹不敢张，力不足

而情有所畏也。所望贤才共靖此难，乃揽涕于黄金之台，呼天而哭昭王，昭王不可复作，贤材不可复致矣。设使乐毅再生，亦将高蹈而远去，孰肯为之用哉！故吾之忠情，徒弥切切，无所补也。时不我知，旅寓蹉跎，失意而返，复自幽州归于江夏（按，应是过贵乡），再听弦歌。”^⑨后世注家的解释，大致亦与此差别不大。由此分析来看，当李白到幽州看到安禄山戈鋌星罗、势摧燕然之景象，则似已清楚地认识到安禄山将谋叛乱，并为此焦虑不安，欲求报效，却因力有未逮，情有所畏，只得驱马返归。

揆情而论，安禄山阴蓄异志以至图谋作乱，其间似有一个发展过程。《资治通鉴》“天宝十载”中记载云：“禄山既兼领三镇，赏罚已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墮弛，有轻中国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讞，劝之作乱。”^⑩可见彼时安禄山已“有轻中国心”，部下严庄、高尚乃劝之作乱，其事尚在萌蘖中。而“天宝十四载”中又记载云：“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⑪由此可见安禄山行事之诡秘，毕竟反叛作乱乃大逆之罪，以安禄山之狡黠，不可能不隐秘其事。其反叛之谋仅核心成员严庄、高尚与阿史那承庆预闻之，故对于八月以来的屡次飨军，众将佐也因不明就里而颇感困惑。安禄山起兵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其在八月尚能如此诡秘其事，因此，李白于天宝十载十月到达幽州时，或可看到幽州戈鋌星罗、禄山气焰煊赫，但他是否就真的能明确判断

安禄山将有起兵反叛之举呢？

李白的《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作于安禄山叛乱发生四年之后，他在诗中对此事的记述，是真实地反映了其当初的感受与判断，还是根据时下作乱已成事实而做出的新表述呢？如果李白真的于幽州之行即已明察安禄山将起兵叛乱，并为之忧心如焚，那么他高度的政治敏感就不能不令人深感钦佩，反之，若李白对此事的叙述是事后对自我记忆的重构，则有必要弄清其做出重构记忆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将李白北上之行前后的相关诗歌做比较考察与分析。

北上幽州之前，李白曾作有涉及其北上动因的作品。其一为《赠何七判官昌浩》：

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因何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

另一为《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兔何足言？天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惆怅何可论？即知朱亥为壮士，且愿束心秋毫里。秦赵虎争血中原，当去抱关救公子。裴生览千古，龙鸾炳天章。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前一诗中，首八句可谓是李白当时生活与心理状

态的真实写照。自天宝三载春出京以后，李白政治失意，一直处于闲散、落寞而又心有未甘状态。他常以逐臣自比，冀望有朝一日重获君王之顾盼。天宝四载，他在《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对朝廷的白发丹心之诚与受到弃置的幽怨：“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夕，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折翮翻飞随转蓬，闻弦虚坐下霜空。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天宝五载，其《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又有诗句云：“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表达了浓重的逐臣恋阙之情。出京以来，他希冀摆脱政治困境的欲望日趋强烈。诗中“夜分匡坐”、“平明啸咤”等语，正反映了他此时内心的焦虑，自觉惟有拂剑而起、收功边塞或可寻找到新的出路。后一首中，他以姜尚、李斯钓周猎秦为喻，说明其北上之行，抱负甚大。诗末反用荆轲易水别离之事典，更衬托出其此行的豪迈。当然诗中“且探虎穴向沙漠”句，却也颇令人疑其此行别有深意在。

但是，李白幽州归来后，在天宝十二载作有两诗也涉及其幽州之行事，即《江上答崔宣州》和《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前诗有“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句，或以为所述即指受安禄山之召赴幽州事，但由于对此诗之系年，学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两句之意诸家解读也有分歧^[6]，故可暂置之。后诗较长，其中涉及幽州之行，有如下诗句：

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禽。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鎗鎗突云将，却掩我之妍。多逢剽绝儿，先著祖生鞭。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

“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说明此次北上幽燕，是为了报效主上之恩。如何报效，或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李白已闻知安禄山有谋反异志而因欲亲入虎穴，一探虚实，上奏朝廷，消弭祸乱于未发。二是幽燕为东北边防重地，李白欲深入其地出奇谋、靖边塞，建殊勋，即《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诗中所谓“方陈五耳策，一使胡尘清”。

从唐代历史看，奚、契丹与唐之关系前后屡有反复，东北边境之不安定由来已久。初唐时，曾有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城州刺史孙万荣等之反叛，时武则天先后两次派大军讨伐不克，后因奚人的反叛，孙万荣败死，其乱乃平。开元后期，又有边将轻启边衅，先胜后败且掩其败迹而冒功，后被朝廷发现，高适《燕歌行》诗序曾叙及此事。而就在李白天宝十载动身北上之前的八月，安禄山曾攻讨契丹，结果败绩，其本人仅得身免^[7]。综合当时唐之边疆形势看，西北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边将，自天宝以来多奏捷报，而东北边情则未能宁靖。特别是自安禄山为东北边将以来，屡启边衅，每多败失。这类东北边情之相关消息，当时必有所传播，高适诗序所及可为一证，料想李白当时对此亦必有所耳闻。如果结合李白动身北上之前安禄山在东北的败绩，以及李白前诗中所谓“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的描述，则其“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之意，当以“出奇谋、靖边塞，建殊勋”为近事实。由此再看其“弯弓绿弦开”至“兼知五兵权”等诗句对自己武功、韬略的描写也就容易理解了。但其在边疆展现的高强武艺，却被“突云将”所遮掩，又被“剽绝儿”占先，故最后发出了“壮志竟谁宣”的慨叹。从诗中李白所述其

在幽燕边地的表现，似很难看出他当时已对安禄山之反叛有明确的判定，否则在明确感受到安禄山的反叛图谋后，他又何必在边地展示武艺，并对“突云将”“剗绝儿”的遮掩、占先感到痛惜呢？

那么，数年之后在写作《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时，李白对其幽州之行关于安禄山之事的记忆和表述何以会出现不同？以情理论，“安史之乱”发生后，与安禄山相关的一切活动已广为公众所关注，此时社会公众对安禄山的认知业已形成一种群体性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就人的记忆而言，个人记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特别是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以他人为参照物的，是在一个既定的、关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社会框架中获取的，因为，‘没有感知也就没有回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记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⁹李白记忆的这种前后变化，当与其个人记忆要受到集体记忆框架的影响有关。在叛乱爆发，特别是公众对安禄山其人的集体记忆已经形成之后，李白对于当年“北上幽州”的记忆难免会受到这种社会集体记忆的影响，故而在他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其自我记忆便不得随之有意或无意被改写，形成其在此诗中这一重要经历的记忆重构。

三、“从璘入幕”经历记忆重构解析

“从璘入幕”是李白生平中又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由此而引发其一连串悲剧遭遇与人生苦难，对李白的暮年影响甚大。由于肃宗朝对李璘东巡事件的定性以及社会舆论对李璘的否定，使得李白在回忆这一经历时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此前他已因此一经历而系狱、流放，此时当他遇赦东归再次出现在公共场所时，他的这一重大经历就

不能不为众人所关心，而他本人也不能不对此有所表白。应该说，这种表白有着特定的情境，我们先看他在《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所作的叙述：

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惟君固房陵，诚节冠终古。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

诗中这一段于“从璘入幕”之颠末原委叙述的比较完整，其中有几个关节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李白对于李璘及其东巡之事的态度。二是他对于自己参加李璘幕府始末的叙述。三是他对于受到流放处理的感受与认识。

李璘东巡起兵之初，肃宗曾敕令其归觐于蜀，李璘不从，肃宗乃布置力量围剿，最终为淮南节度使高适、淮南西道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所剿灭。李璘兵败后，《新唐书·李璘传》记载肃宗“以（璘）少所自鞠，不宣其罪”，但实际上是以谋乱之罪对李璘及其僚属做出认定与处理的^[9]。由此也导致了社会舆论对李璘在政治评价上的贬斥。比如杜甫对李白从璘后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对于李璘则不假辞色^[10]。李白在李璘兵败后乃至陷入杜甫《不见》诗中所谓“世人皆欲杀”的险恶局面，由此也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于李璘东巡的态度与倾向。但李白对于李璘的态度，尤其是其在诗歌中的表述，却值得玩味。他在诗中首先说明在长安失陷、二帝出游的背景下，李璘是“帝子许专

征，秉旄控强楚”，也就是说李璘作为上皇之子，是受命于玄宗而享有“专征”权力的，其秉节旄、控楚地都具有合法性。这说明，李白对李璘及其东巡的态度与时议是有差异的。而他的这一认知及表述，也有着其前后的一贯性。在李璘兵败之初朝廷尚未为其定性之前，李白于逃亡途中所作诗歌也曾涉及李璘东巡事。其《南奔书怀》一诗中曾有如下的描述：

櫓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历数方未迁，云雷
虑多难。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南奔剧星火，
北寇无涯畔……

这里“櫓枪扫河洛”四句对时局背景的揭示，不是和“二帝出游豫，两京遂丘墟”相似吗？“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与“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以及“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与“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之间，不也有着前后的一致性吗？

“仆卧香炉顶”以下四句，叙述李白入幕前隐于庐山事，也是完完全全的事实，这有其《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诗可证。但“半夜水军来”以下八句陈述入幕经过以及入幕之后事，则与此前相关诗歌的叙述有所参差了。李白参与李璘幕府，确曾受李璘幕下的游说，但是否出于胁迫，似可讨论。首先，李白在入幕前与妻宗氏作别，写有《别内赴征三首》诗，其一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别离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见须上望夫山。”又，其《与贾少公书》亦有“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语，则李白入幕之前，李璘曾有过多次的邀聘。《旧唐书》李璘本传载其任四道节度采访等使与江陵郡大都督后，“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

署”^⑪，故他在起兵东巡之际邀请天下名士入幕以壮声势，并对李白辟书三至，也并非不可想象。但“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乎是李璘引兵东下至浔阳时，忽然想到庐山隐居的李白，遂胁迫其入于幕府，这与其此前的叙述就不一致了。在李白入幕前，韦子春曾作为李璘的说客，上庐山力邀李白，为此李白写下了《赠韦秘书子春》一诗，其末尾写道：“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从中可以看出，李白之下山入幕，应是受到了韦子春为其所话“良图”的鼓舞，并因此触动其“安社稷”的人生理想而做出的人生抉择，这与所谓“胁迫上楼船”的叙述也是有出入的。此外，李白是否受到李璘五百金的赏赐，已无可考究，但其入幕之后参与了当时东巡幕府的一些活动，则是事实。他曾在幕府侍宴，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等诗。在《南奔书怀》中，也有“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的描述。特别是其《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更造成了与他所表白的当时与李璘取不合作态度的困窘。

“辞官不受赏”以下，叙述了李白由于参与李璘幕府而长流夜郎事。李璘兵败，为皇甫侁杀于传舍，其子瑒亦死于乱兵。由于李璘东巡事瞬间已平息，对于肃宗之皇位并没有造成影响，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发生的这件手足相残之事，其社会影响却是很大的，如何处理李璘及其僚属，也自然成为社会的关注点之一。李白是名扬天下的大诗人，其参与李璘幕府，本出于“安社稷”的目的，用他《南奔书怀》中的话说是“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欲清中原”，现在被处以长流之严遣，且这种处罚又是发生在两京收复、二帝回銮、举国欢庆之时，这怎能不使他产生“日月无偏照，何由

“诉苍昊”的悲叹。其实,李白的冤屈,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人们都有所认识。比如,追慕李白的魏颢当时即已指出:“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朝廷忍白为长沙、汨罗之俦……吾观白之文义,有济代命,然千钧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时。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倘黄祖过祢,晋帝罪阮,古无其贤。”^[12]宋人蔡启也说:“太白岂从人而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之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13]李白被处以长流,显然是以其作为“谋乱”分子而予以惩罚的。在肃宗已作出这样判定的情况下,恐很难有人敢于公开为之剖白了。在李白长流夜郎方遇赦归来之际,李璘案仍是当时重要而敏感的话题,他只有谨慎而策略地说明其入幕本非主动,或可为其冤做退一步的辩解,但其实李白之冤并不在此,而在于肃宗处理李璘事件时的虚伪与定罪的虚妄^[14],这应该不仅是李白心中明白的,也是时人虽知而不敢公开议论的。

李璘东巡败亡后,“从璘入幕”已成为李白心中的创痛,在流放归来之际回忆这段经历,无异于重撕尚未痊愈的旧伤。但是在写作《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时,他的这段经历又是难以回避的,作为著名诗人,李白长流夜郎是为当时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其原因即本于“从璘入幕”事,因此在地方太守设宴款待的场合,李白必须对当时人们的关注有所回应。他在诗中所叙,在抱冤的同时,复期表白自己的无辜与道义的无亏,故其对于李

璘本人的态度,前后有所坚持,而对于入幕的过程,受集体记忆的框架影响,以及或当出于政治安全意识,乃有所改写与重构。

四、记忆重构与李白的政治追求及其精神品格

李白的一生,对于参与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热望,“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是其政治生涯中两次最为重要的活动。对于这两次活动,李白在事发前后不同的作品中表述参差,这曾引起人们的疑惑乃至非议。尤其是“从璘入幕”事,不仅曾导致了李白政治上的灾难,也给后世读者认识李白其人其诗带来了困惑。一些读者竭力弥合其中的凿枘不谐,如明人许学夷即说:“太白之从永王璘,出于迫胁,东坡尝辨之矣。其《忆旧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云。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是也。或以太白《永王东巡歌》为累。《东巡歌》十一首,第九首昔人辨其为伪,其他篇篇规讽,无一语许其僭窃,乃以为太白累也。”^[15]清人潘德舆也说:“按太白于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白后为《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又《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清霞漱流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如浮云。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夫胁而来,逃而去,辞官弃金,未汗爵赏,白之行迹,可以昭告天下矣……观太白《永王东巡歌》曰:‘二帝巡游俱未还,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是太白直言东下之非,而劝以西上勤王,拥卫二帝,与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胁之困,逃去之勇,均于此可见。而浅者非加以诋诃,则为之文饰,蒙冤不洗,

而徒日诵其诗，以为神品，又何赖有此知音哉？为
之三叹。”^[16]但也有人从李白的识见乃至人品角
度提出了批评，如明人瞿佑《归田诗话》云：“老杜
诗识君臣上下，……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
东巡歌》，略无上下之分。二公虽齐名，见趣不同
如此。”^[17]而苏辙语更尖刻：“李太白诗类其为人，
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
在也。……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
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
诗皆在。杜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18]由此可
见，合理阐释李白《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有关
身世经历的自我记忆与此前诗歌记述上的参差，
对于正确地认识李白其人与其诗至为重要。

李白“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之自我记忆
的变化与重构，上文已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关
系的角度，略作解说。其实，除了上述因素外，李
白对此两段经历的记忆重构，还与其暮年渴望报
效国家的政治热情与企望有很大关系。

后世常将《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与杜
甫《北征》相提并论，但又从叙事的角度为李白叙
述“失真”而感到遗憾，以为在这一点上，李白不
及杜甫叙事具有“诗史”品格。实际上，这是没有
看到二诗在目的与功用的区别。清人陈仪曾以
“文体”之别论二者不同云：“太白《经乱忆旧游书
怀赠江夏韦太守》诗，书体也；少陵《北征》诗，记
体也。”^[19]如就不同文体的功用而言，“夫书者，舒
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记者，纪事之文
也”。^[20]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这首诗虽多叙事，但
其目的却在于陈情，尤其诗的末尾部分叙交谊、
忧时局，更是全诗的结穴处：

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

黄鹤楼。顾惭称处士，虚对鹦鹉洲……览君荆山
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
横素襟，无时不招寻。朱门拥虎士，列戟何森森。剪
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登楼坐水阁，吐论多英音。
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
心。五色云间鹄，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
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无死灰。君登凤池去，勿
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
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西山，黄河当中流。连鸡
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君登凤凰池，勿弃贾生才”之句表明，遇赦方归的
李白，心中还抱着再受朝廷重用的期望，他希望韦
良宰这位将登凤池的旧友，能够归朝荐贤，使他能
如遭贬的贾谊那样重入宣室。而李白之所以希望
得到重用，如其诗中所言，乃因时局尚是“桀犬尚吠
尧，匈奴笑千秋”，致其忧心国事而至于“中夜四五
叹”，正是希图自己能对朝政有所补益，他在回溯往
事时以天才的自负重塑了理性的自我政治形象，
表明自己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更是本着“安社稷”之
心而入李璘幕府。李白之报国热忱，于此可见。

因此，李白在《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围绕
“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二事之经历的记忆重
构，是有着特殊的的原因的。李白虽经长流之冤，但
遇赦归来，报国之赤诚未改，为了实现其报国之
愿望，他在回忆自己身世经历时，有意无意之中
对某些记忆做出改造与重构。对于当时的李白
而言，回顾既往，记录前尘，实在是一种令人尴尬
的往事追忆。千载之下审视这一问题，我们自应
顾及当时特殊的情境，对李白的自我身世记忆之
重构，给予充分的理解并做出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李白流贬的遭际，使他对于交道之反复无常感触甚深。同年所作《赠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有“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的慨叹。本诗中也有“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语，可见韦良宰对李白的礼遇，使其铭感至深。
- [2] 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691页。
- [3] 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674—1675页。
-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905页。
-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934页。
- [6]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2728—2729页）于此诗末【备考】下列王琦《年谱》、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校注》、安旗及薛天纬《李白年谱》、薛天纬《李白幽州之行探》、杨明《读李小识》、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丁立群《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诗试解》等诸家对此诗理解之不同，可参看。
- [7]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中有记载（第6908—6909页）：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弩筋胶皆弛，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敝，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貌类禄山，虏争击，杀之，勇气倍增。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解，得入师州……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救禄山，契丹引去，禄山乃得免。至平卢，麾下皆亡，不知所出。”
- [8]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 [9] 《新唐书》卷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2页。《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9页）载：宝应元年五月，“丁酉……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宜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可知肃宗朝对李璘及其东巡是做出有罪认定的。
- [10]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在叙及李白从璘事时，有“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的诗句，在为李白开脱的同时，对李璘则持贬斥的态度。
- [11] 刘昫：《旧唐书》卷一〇七《李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64页。
- [12] 魏颢：《李翰林集序》，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33页。
- [13] 蔡启《蔡宽夫诗话》，金涛声、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6页。
- [14] 关于李白因“从璘入幕”引致的系狱、流放之冤，拙文《“从璘入幕”罪案与李白暮年的冤愤》（《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曾有分析阐释。
- [15] 许学夷：《诗源辩体》，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 [16] 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郭绍虞选编：《清诗话续编》，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77—2179页。
- [17]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6页。
- [18] 金涛声、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
- [19] 陈仪：《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第2229页。
- [20]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8、145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李芳民：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的葬式分析

陈洪海

内容摘要:甘肃青海地区位于东西方交流要道,近百年来通过对陶器为主要对象的出土遗物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经基本确定。但是陶器仅仅是人们生活用具的一部分,在反映人的组群方面相对而言不如,埋葬习俗更为准确。本文对尸骨的摆放姿势这一主要葬俗进行统计分析,认定史前时期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人群分占着不同的地域,并且有着较强的时间延续性。本文所论葬俗反映的人群流变过程,是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另一种诠释。

本文所述甘青地区包括甘肃省大部和青海省东部,所述史前时期是指新石器时代和进入周秦汉文化之前的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通过陶器研究,该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基本确定,可以概括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辛店、卡约、寺洼、沙井文化这样四个大的阶段,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鉴于陶器仅仅是人们生活用具的一部分,在反映人的组群方面相对而言不如葬俗更为准确,本文拟从葬俗的一个主要方面,即葬式入手,对甘青地区史前人群及其变迁做一点探讨,以期对于该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稍有推进。错讹之处敬请指正。

一、诸墓地葬式统计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比较普遍的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和俯身直肢葬三种,文中用统计表的方式表现,较为特殊一些的加以文字说明。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大部分资料进行分析。

马家窑类型时期墓葬材料不多。兰州市元

代王保保城址发现1座^[1];青海省乐都县脑庄发现1座^[2],该墓在考古人员到达时候已被村民破坏,询问情况得知可能也是仰身直肢葬;青海民和核桃庄发掘1座^[3]。比较多的墓葬是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具体材料至今没有发表,大约21座,全都是二次扰乱葬,从保存下来的下肢骨看多是仰身直肢葬^[4]。青海省同德县宗日墓地,因为大多数墓葬随葬品显示了一些新的内涵而被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5],但是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墓葬其随葬品还是马家窑文化特征,或更加鲜明一些,可以确定在马家窑类型阶段的墓葬有48座^[6],有人骨墓葬46座统计人骨52具。上述资料予以综合列为表一。

半山-马厂时期的墓葬资料最为丰富。主要有甘肃兰州花寨子墓地49座^[7];甘肃兰州土谷台墓地59座墓葬统计人骨105具^[8];甘肃康乐县边家林墓地清理墓葬17座^[9],报告把葬式分为三类分别是捡骨葬8座、扰乱葬2座和侧身屈肢葬2座,除了第一类看不清葬式以外,第二类所举两例都是侧身屈肢葬,可以想其余的也是一样,那么与第三类加起来就是9座墓葬占53%;甘

表一 马家窑类型时期葬式统计表

葬式 遗址或墓地	仰身直肢数量		侧身屈肢数量		俯身直肢数量		葬式不明数量		人骨数 量(具)	墓葬数 量(座)
	具	%	具	%	具	%	具	%		
甘肃兰州王保保城	1	100							1	1
青海民和核桃庄							1	100	1	1
青海互助脑庄	1	100							1	1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		20?							80?	21?
青海同德宗日	8	15			27	52	17	33	52	48

肃广河县地巴坪墓地有半山类型墓葬 66 座统计人骨 41 具^[10];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清理墓葬 22 座^[11],无人骨 1 座,3 座仰身屈肢葬因为不多见并且总是与侧身屈肢同时出现,我们理解是因为下葬时候的不在意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变化,因此也归入侧身屈肢葬范畴,统计人骨 21 具。青海民和核桃庄马牌墓地清理马厂类型墓葬 62 座统计人骨 60 具^[12]。以上诸墓地可以辨认葬式者全部是侧身屈肢葬,甚至二次葬也摆放成侧身屈肢样,所以可以认定为单纯的侧身屈肢葬墓地。

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清理墓葬 189 座,报告发表了 176 座墓葬资料,统计人骨 187 具^[13];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清理半山类型墓葬 65 座^[14],除去没有人骨或者仅存朽迹的以外,共有人骨 49 具,1 座仰身屈肢葬计入侧身屈肢葬;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发掘墓葬 218 座^[15],其中 156 座墓葬出有人骨,因为一次合葬墓多数是 2 人或 3 人,那么分辨不出几个人合葬的二次扰乱墓葬我们按 2 人合葬统计,则共计人骨为 195 具,仰身、侧身、俯身的屈肢葬统一到侧身屈肢葬里面;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有半山类型墓葬 257 座,马厂类型墓葬 872 座^[16],半山类型的 257 座墓葬报

告中称仅有 183 座有人骨架,可是后面的葬式介绍却是没有剔除不明白的另外 74 座墓葬,因为附录的墓葬登记表中合葬墓没有说明葬式,正文中也没有全部介绍,所以我们不能对所有的葬式做出统计,只能是统计单人墓的全部和合葬墓的一部分(二人合葬墓的 5/12、三人合葬墓的 3/10、四人合葬墓的 1/2、五人合葬墓的 3/4、六人合葬墓的 3/4、七人合葬墓 1),共计人骨 287 具;马厂类型 872 座墓葬中也有 813 座出人骨的墓葬的记录,同样是在分类介绍中没有说明另外的 59 座墓葬为何并入了单人墓,合葬墓也是仅能统计一部分(二人、五人、六人合葬的全部,三人合葬墓的 6/10,四人合葬墓的 1/2),共得人骨 862 具;青海同德宗日墓地相当于半山 - 马厂阶段的墓葬大约 129 座,112 座出有人骨的墓葬中共计人架 122 具,统计表中的 20 具仰身直肢葬里面实际上包含有 9 具侧身直肢葬,所以其比例就偏高了。以上几个墓地都是包含有几种葬式的。

青海循化西滩遗址清理半山类型墓葬 1 座,俯身直肢葬^[17];尖扎县直岗拉卡半山类型墓地共清理墓葬 25 座^[18],其中 11 座无人骨,另外的有迁葬和断肢葬等称谓,没有登记表并且简报中没

有交代各类墓葬的数量,从图上可以看出4具人骨是俯身直肢葬,其余的不清;这两处是比较单纯的俯身葬。青海互助总寨墓地6座马厂类型墓葬均是单人葬^[19];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有3座墓葬^[20];兰州徐家山东大梁清理墓葬4座^[21],2座比较完好的墓葬人骨腐朽并且凌乱,从痕迹看原摆放姿势应该是直肢葬,姑且定为仰身直肢葬;兰州红古城东北第二台地上1971年发现2座马厂类型墓葬^[22],都是单人墓,1座确定是仰身直肢葬,另外的因为腐朽看不清楚,估计也是

仰身直肢葬;这几个零散的材料都是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要埋葬方式的。上述资料予以综合列成表二。

齐家文化时期的墓葬,主要有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清理墓葬82座统计人骨87具^[23];甘肃永靖秦魏家墓地清理墓葬138座统计人骨162具^[24];甘肃武威黄娘娘台遗址清理墓葬26座,报告中介绍了22座^[25],没有墓葬登记表,从文字和图版中统计得人骨27具;青海互助总寨墓地清理齐家文化墓葬10座,从登记表中统计人骨13具^[26];夏

表二 半山-马厂时期的葬式统计表

葬式 遗址或墓地	仰身直肢数量		侧身屈肢数量		俯身直肢数量		不明数量		人骨 总数 (具)	墓葬 总数 (座)
	具	%	具	%	具	%	具	%		
甘肃兰州花寨子			14	29			35	71	49	49
甘肃兰州土谷台			72	78			33	22	105	59
甘肃康乐县边家林			9	53?			8	47	17	17
甘肃广河地巴坪			31	78			10	22	41	66
甘肃景泰张家台			15	71			6	28	21	22
青海民和核桃庄马牌			34	57			26	43	60	62
青海民和阳山	1	0.5	40	20.5	68	35	86	44	195	218
青海乐都柳湾半山	88	30			5	2	194	68	287	257
青海乐都柳湾马厂	595	69	47	5	1	0.1	219	25	862	872
青海同德宗日	20	16			51	42	51	42	122	129
青海循化苏呼撒	3	6	4	8	1	2	41	84	49	65
青海尖扎直岗拉卡					4	29	10	71	14	25
青海循化西滩					1	100			1	1
甘肃永昌鸳鸯池	127	68	6	3			54	29	187	176
甘肃兰州青岗岔	2	67					1	33	3	3
青海互助总寨	5	83					1	17	6	5
甘肃兰州红古城	2	100							2	2
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	2	100							2	2

鼐先生 1945 年在甘肃阳洼湾清理齐家文化墓葬 3 座^[27];最多的一批材料还是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报告所分出的齐家文化墓葬计有 366 座,统计人骨 426 具^[28],断肢葬 1 具因为膝骨以上形态而归入仰身直肢葬,屈肢有仰身和俯身两种,我们也将之统计为侧身屈肢葬范畴内;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墓地清理墓葬 43 座,材料没有发表,从公布的消息来看应该全是俯身直肢葬^[29],鉴于该处肯定存在二次扰乱习俗,我们对于葬式只好估计俯身直肢葬大约占 80%。将齐家文化时期墓葬材料予以归纳列为表三。

青铜时代的诸文化有甘肃的寺洼文化、甘青交界的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卡约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及稍晚一点的沙井文化。共同的特点除了比较普遍流行二次扰乱葬以外,在葬式上也趋于统一,都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其余葬式比较少见。寺洼文化主要有如下几处:甘肃合水九站发现墓葬 80 座^[30],按墓葬登记表统计人骨 83 具,表中所记人数为 1 但是没有人骨架的我们也计入总人数,人骨经过了二次扰乱但是还能看出葬式的从二次葬中提出来计入各自的具体

葬式中(以下其他墓地也是如此处理,不再另外说明);甘肃庄浪徐家碾清理墓葬 104 座^[31],有仰身直肢葬和“迁骨葬”两种葬式,没有见到可以参考的数据比例;甘肃西和栏桥清理 9 座墓葬^[32],都已经过二次扰乱;甘肃临洮寺洼山夏鼐先生记录墓葬 7 座^[33],包括火葬骨灰罐计有 8 具人骨。辛店文化墓葬资料主要有:青海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墓地 33 座墓葬^[34],除去 7 座无人墓共计人骨 26 具,1 具侧身直肢葬计入仰身直肢葬统计;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 367 座墓葬统计人骨 360 具^[35];甘肃临夏莲花台清理墓葬 18 座得人骨 17 具^[36]。除此之外零星发现的资料是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辛店文化墓葬 5 座,甘肃东乡崖头墓地 4 座墓葬^[37],甘肃永靖姬家川遗址 1 座墓葬^[38]。卡约文化的墓葬已经发掘了数以千计,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没有发表报告,根据李国林、卢耀光文中“属于俯身葬和侧身葬的共 61 座占不到 5%……可明确定为仰身直肢葬的(包括个别侧身直肢葬)264 座仅占 24%”这样的描述^[39],推算该墓地应该有墓葬 1100 座左右,统计时候把侧身直肢葬只好仍然包括在仰身和俯身中,得出仰

表三 齐家文化葬式统计

葬式 遗址或墓地	仰身直肢数量		侧身屈肢数量		俯身直肢数量		不明数量数量		人骨 数量 (具)	墓葬 数量 (座)
	具	%	具	%	具	%	具	%		
甘肃武威黄娘娘台	14	52	10	37			3	11	27	22
甘肃永靖大何庄	62	71	15	17			10	12	87	82
甘肃永靖秦魏家	129	80	20	12	2	1	11	7	162	138
青海乐都柳湾	327	77	12	3			87	20	426	366
青海贵南尕马台						80?		20?	?	43
青海互助总寨	3	23					10	77	13	10
甘肃宁定阳洼湾	2	67					1	33	3	3

身直肢葬 264 座,葬式不明 775 座左右的大概数据;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墓地清理墓葬 217 座,资料也是没有发表,从有关论述中得知有俯身葬 1 座,二次扰乱葬占 88% 也就是大约 191 座,其余的是仰身直肢葬也就是 25 座^[40];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可以确定为卡约文化的墓葬 22 座^[41],2 座腐朽难以辨认归入葬式不明共计人骨 24 具;青海贵德山坪台墓地发掘墓葬 90 座^[42],7 座无人骨、11 座二人合葬统计人骨 94 具,30 座瓮棺葬的 39 具婴儿计入葬式不明部分,1 具侧身直肢葬计入仰身直肢葬内;青海化隆下半主洼墓地清理 16 座墓葬^[43],3 座无人骨、1 座二人合葬共

计 14 具人骨,瓮棺葬 1 座计入葬式不明者。四坝文化以甘肃民乐东灰山墓地发掘墓葬 249 座,对人骨的描述非常细致,在登记表中把仅有零星碎骨的按 1 人统计,共计人骨 298 具;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资料没有发表,只是报道了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量侧身屈肢和俯身葬^[44]。沙井文化墓葬资料仅取甘肃永昌蛤蟆墩墓地的 20 座墓葬统计^[45]。如上资料予以综合列为表四:

二、几种摆放姿势的区域性与时间性分布

结合上面的统计表,我们来看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直肢这三种尸骨摆放方式的时空分

表四 青铜时代诸文化葬式统计表

葬式 遗址或墓地	仰身直肢数量		侧身屈肢数量		俯身直肢数量		葬式不明数量		人骨 数量 (具)	墓葬 数量 (座)
	具	%	具	%	具	%	具	%		
甘肃合水九站	34	41	4	5	1	1	44	53	83	80
甘肃庄浪徐家碾	?						?			104
甘肃西和栏桥	7	78					2	22	9	9
甘肃临洮寺洼山	3	37					5	63	8	7
青海民和核桃庄山家头	20	77			2	8	4	15	26	33
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	79	22	4	1			277	77	360	367
青海乐都柳湾	1	20					4	80	5	5
甘肃临夏莲花台	9	53	2	12			6	35	17	18
甘肃东乡崖头	3	75					1	25	4	4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	264	24			61	5	775	71	1100	1100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	25	11.5			1	0.5	191	88	217	217
青海循化苏呼撒	7	29					17	71	24	22
青海贵德山坪台	14	15					80	85	94	90
青海化隆下半主洼	11	79					3	21	14	16
甘肃民乐东灰山	25	8					273	92	298	249
甘肃永昌蛤蟆墩	17	85					3	15	20	20

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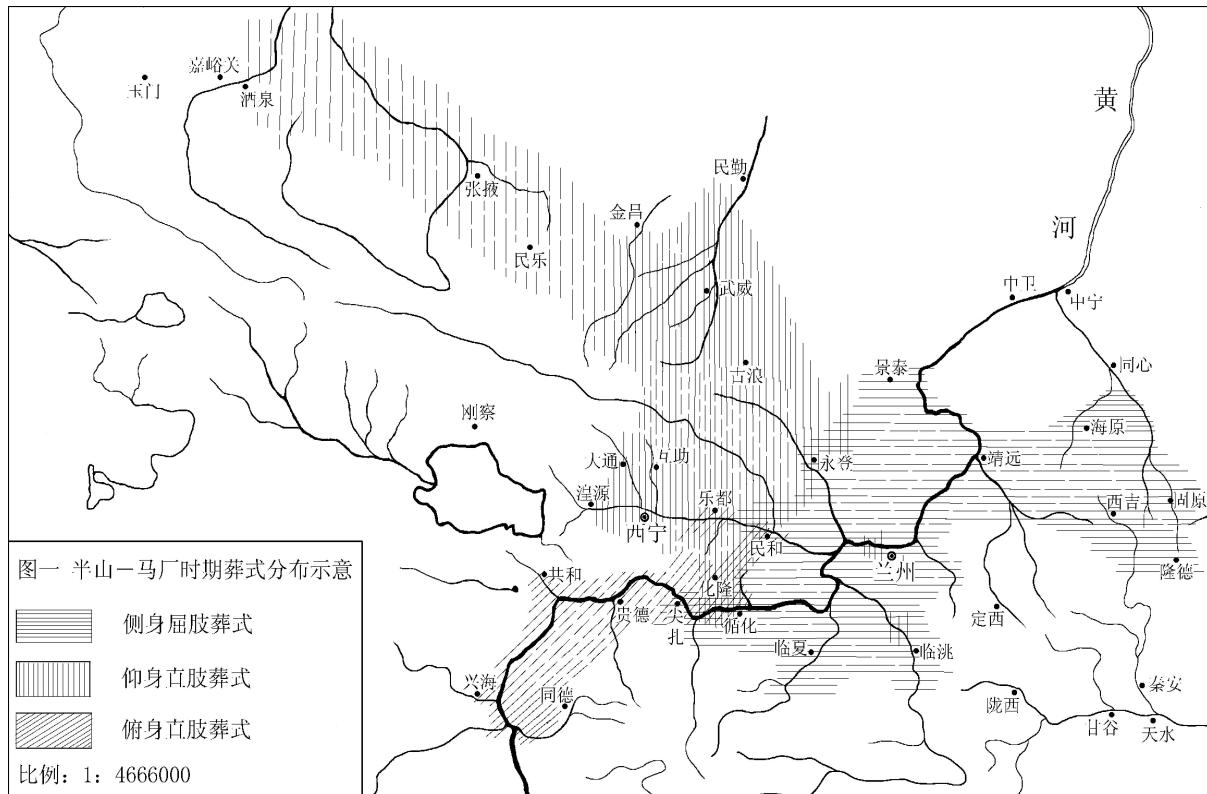
马家窑类型时期墓葬发现数量不多,也许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分布判断,但是宗日墓地的大量俯身葬值得注意,在可辨葬式的35具人骨中俯身直肢葬占了27具,比例竟达到了77%,可以说是一种主要葬式。那么这一时期的分布就可以理解为宗日遗存分布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黄河两岸为俯身葬地区,之外的甘肃大部和青海东部地区流行仰身直肢葬。虽然有两个分布区可以画出来,实际上比较确定的就是一个俯身葬分布区,因为其他地区尚不明朗。

半山—马厂时期从统计表可以看出明显分为三组,侧身屈肢葬组包括兰州花寨子、兰州土谷台、康乐边家林、广河地巴坪、永泰张家台、民和核桃庄马牌;仰身直肢葬组包括兰州青岗岔、兰州徐家山东大梁、兰州红古城、青海互助总寨;俯身直肢葬组仅有青海尖扎直岗拉卡、青海循化西滩。其余地点葬式不单纯,柳湾半山、柳湾马厂、永昌鸳鸯池三处仰身直肢葬占绝大多数,在可辨葬式人骨中所占比例分别是95%、93%、95%,因此并入仰身直肢葬组;同德宗日墓地俯身葬在可辨葬式中所占比例为72%,考虑到还有13%的侧身直肢葬也有俯身的可能,所以实际比例应该更高,我们将之归入俯身直肢葬葬组;民和阳山俯身葬和屈肢葬的比例分别是62%和37%,倾向于俯身葬组但是与屈肢葬组关系很近;循化苏呼撒墓地可辨葬式者仅仅8座,不好归类但是倾向于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两组。放在地图上看,屈肢葬组分布在东起景泰西止民和的黄河、洮河、大夏河流域和湟水下游;俯身葬分布在东起民和西止同德的湟水下游和黄河两岸,以黄河流域为主;仰身直肢葬分布面很

广,若是因为墓葬数量太少而排除了兰州青岗岔、兰州徐家山东大梁、兰州红古城三处,那么其他的墓地就相对集中于湟水中游和河西地区。三者之间虽有交叉,但是各自的中心区域还是很清楚的:东部的屈肢葬、西部黄河流域的俯身直肢葬、西部河西地区和湟水中游的仰身直肢葬,三个分布圈在湟水流域形成交汇区(图一:半山—马厂时期的葬式分布区域)。

齐家文化时期单纯的屈肢葬墓地消失了,甚至以屈肢葬为主的墓地也没有发现,曾经的屈肢葬地区依然存在着这种葬式,但是仅占少数,而上期的仰身直肢葬中心地区屈肢葬比例却增加了,例如武威黄娘娘台墓地在可辨葬式的人骨中屈肢葬所占比例达到了42%。这种仰身直肢葬与屈肢葬的融合或许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后面我们还要讨论。该时期俯身葬依然存在,青海贵南尕马台的43座墓葬,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是面向下的俯身葬^[46],谢端琚先生就曾经指出“似乎具有地区性特点”^[47],我们知道这是马家窑类型以来该地区的文化传统。故此齐家文化时期可以画为两个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黄河流域为俯身葬区,其余地区归入仰身直肢葬分布区,后者包含一部分屈肢葬,还有极少数的俯身葬。

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分裂为若干个考古学文化,与此分化相反的则是葬式的统一化,传统的俯身葬分布区内,仰身直肢葬也一跃成为主要的埋葬方式^[48],其他地区俯身葬、屈肢葬也是较为罕见。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发现存在俯身葬,甘肃临夏莲花台、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也有少量屈肢葬,这恐怕属于该地区文化传统的孑遗了。这一阶段只有一个葬式分



图一 半山—马厂时期的葬式分布区域

布区，就是仰身直肢葬。

总的看来，俯身葬分布区的中心在青海省海南州的黄河谷地，最初形成于马家窑类型时期，范围较小但很独立；到半山—马厂时期中心范围有所扩大，向东顺黄河而下到了循化县，向北越过了拉脊山进入湟水中游；齐家时期中心区缩回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可是甘肃的永靖也有发现；青铜时代独立的分布区消失，湟水流域有少量分布，黄河沿岸也是偶有发现，有关论述也仍以俯身葬为卡约文化的特征之一^[49]。屈肢葬的中心区在景泰到民和间的黄河及其支流下游，半山—马厂时期中心范围非常清楚，影响范围到达青海的循化和乐都；齐家时期沦落为次要葬俗，但是范围有所扩大；青铜时代趋于消失。仰身直肢葬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葬式，马家窑类型时期分布于甘

肃大部和青海东部；半山—马厂时期的中心区在湟水中游和河西地区；齐家期并吞了屈肢葬区域；青铜时代成为甘青地区统一的葬式；这是一个逐步扩展的分布区。

三、葬式与相关葬俗的关系

埋葬习俗一般包括墓穴形制、葬具、方向、随葬品，还有入葬者的次数、人数、性别、年龄等因素，那么葬式与这些方面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下面稍做分析。

甘青史前墓葬的墓穴形制主要就是两种——竖穴土坑和横穴洞室，后者又有“凸”字型洞室墓与侧室偏洞墓之分。马家窑类型时期普遍使用竖穴土坑墓；半山—马厂时期洞室墓出现，集中分布在湟水下游的兰州土谷台、民和马排、乐都柳湾等几处墓地，正是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

分布区的交汇地区,民和阳山和柳湾半山还没有出现,只是到了民和马排和柳湾马厂时候才蔚然成风,可以考虑是受了东边土谷台的影响;齐家时期仅有乐都柳湾存在洞室墓,显然是马厂时候的传统;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比较流行侧室偏洞墓,沙井文化也较普遍,可是这时候已经没有葬式上的区域划分了。鉴于屈肢葬区的多数墓地尚不流行洞室墓,所以即使在三种葬式划分最清楚的半山-马厂时期,墓穴与葬式的分布也是不能重合的,因此可以说墓葬形制与葬式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各自的分布属于不同层次上的区分。倒是墓穴的平面形状与葬式密切相关,俯身和仰身的直肢葬一般是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窄而长;屈肢葬则接近于方形或者椭圆形,宽而短。原因在于安葬死者的方便,谈不上特殊的意義。

葬具有棺椁之分。依笔者对该地区葬具的理解:椁是在墓室中搭建起来的,棺是敛入尸体后置于墓室中的,据此所谓的石棺墓应该都是石椁墓,很多木棺墓也应改称木椁墓才是。目前发现的石椁墓还比较少,仅有青海同德宗日马家窑类型时期和半山-马厂时期墓葬、甘肃景泰张家台半山时期墓葬和青海民和簸箕掌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墓葬^[50],前两处分属屈肢葬和俯身葬,后一处则是辛店文化了,可知石棺使用与葬式关系不大。木椁的分布区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同德宗日和循化苏呼撒比较普遍,是用圆木和劈开的半圆木搭建起来的,无底,顶盖或有或无;木棺的分布区是在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是比较正规的六面木棺;其余地区基本上不使用葬具。这样看木质棺椁也是与葬式的分布不完全重合的。

墓葬方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拟另文予以讨论。王仁湘先生曾经做过一些分析^[51],指出了其中的复杂性。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在葬式上以俯身葬和屈肢葬为主,墓向又有进一步的区分,表现出葬式与墓葬方向的层次不同;据张弛先生对兰州土谷台墓地的分析,在全部是屈肢葬的墓地里面,人骨头向则有东西两种并且各自成组^[52],更说明其反映的不是同一人们共同体。

人数、性别、年龄、随葬品更是复杂。总体而言各种葬式中都是单人葬为主,没有太大的性别区分;儿童因为腐朽或者瓮棺而多是姿势不明。随葬品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些工具、装饰品等男女差异也不因为葬式而有变化。目前讨论较多的是齐家期的男女合葬以及男人与儿童的合葬问题。迄今为止齐家文化的成年二人合葬墓44座,一人仰身直肢一人侧身屈肢的共31座,占70%,不明和姿势相同的仅占30%,前者凡是鉴定过性别的均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没有一例相反的,这就是说在成年二人合葬墓里面,主要是以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为主要形式。成年与儿童的二人合葬墓共计13座,成人仰身直肢、儿童侧身屈肢的7座,占54%,皆仰身直肢的1座,占8%,其余的不明,成人鉴定了性别的基本上男性,就是说男性成人仰身直肢、儿童侧身屈肢也是一个主要特色。多人合葬墓也有这样的情况,不一一列举。由此可以认为:男性地位高于女性,女性被迫殉葬;成年男性地位高于儿童。此结论曾经作为齐家文化进入了等级社会的根据,反映了男女不平等到了可以决定一方生死的程度。可是应该考虑的还有几点:第一,屈肢葬是一种传统葬式,齐家之前就曾经流行过并

且有其固定的分布范围,齐家之后侧身屈肢葬在秦人墓里依然流行。即使仰身直肢与侧身屈肢的合葬,也不是齐家期才有的。柳湾马厂类型墓葬 M327 则是中间侧身屈肢两边仰身直肢的例子^[53],这座墓葬中间的侧身屈肢者似乎还有一些地位低下的迹象,例如一条腿被压在了仰身葬者的木垫板底下,并且随葬品也有不属于他的感觉;可是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54]的五人合葬墓 M24,位居中间的 3 号人骨还抱有一个小孩,看不出地位低下的迹象。第二,侧身屈肢葬的具体姿势也有不同,卷屈特甚的单人墓与面向男性的下肢微屈人骨应该区别看待。第三,单人一次的男女合葬理解为殉葬的话,那么成年男人与儿童的一次合葬是不是也是殉葬?虽然有妻妾殉葬的民族学资料,可是用儿女殉葬恐怕不好寻找。第四,齐家时期单人墓侧身屈肢姿势的存在也值得重视,从随葬品数量与同一墓地的其他葬式比较或许就能够看出是不是地位有高低之分。例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墓地中^[55],还有 14 座单人屈肢葬墓葬,仅有 2 座墓随葬了陶器,分别是 1 件和 2 件,与仰身直肢葬相比贫富差距极为明显,这种差别就不能仅仅用男女性别来解释了。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对此现象做各方面的综合分析,才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地解释,不至于片面曲解。

四、摆放姿势反映的人群及其变迁

甘青地区彩陶的出现是东部地区史前文化西渐的结果^[56],陇东地区本就是与关中地区同步发展的,以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东部地区并无太大区别,到了马家窑类型就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地区差异在产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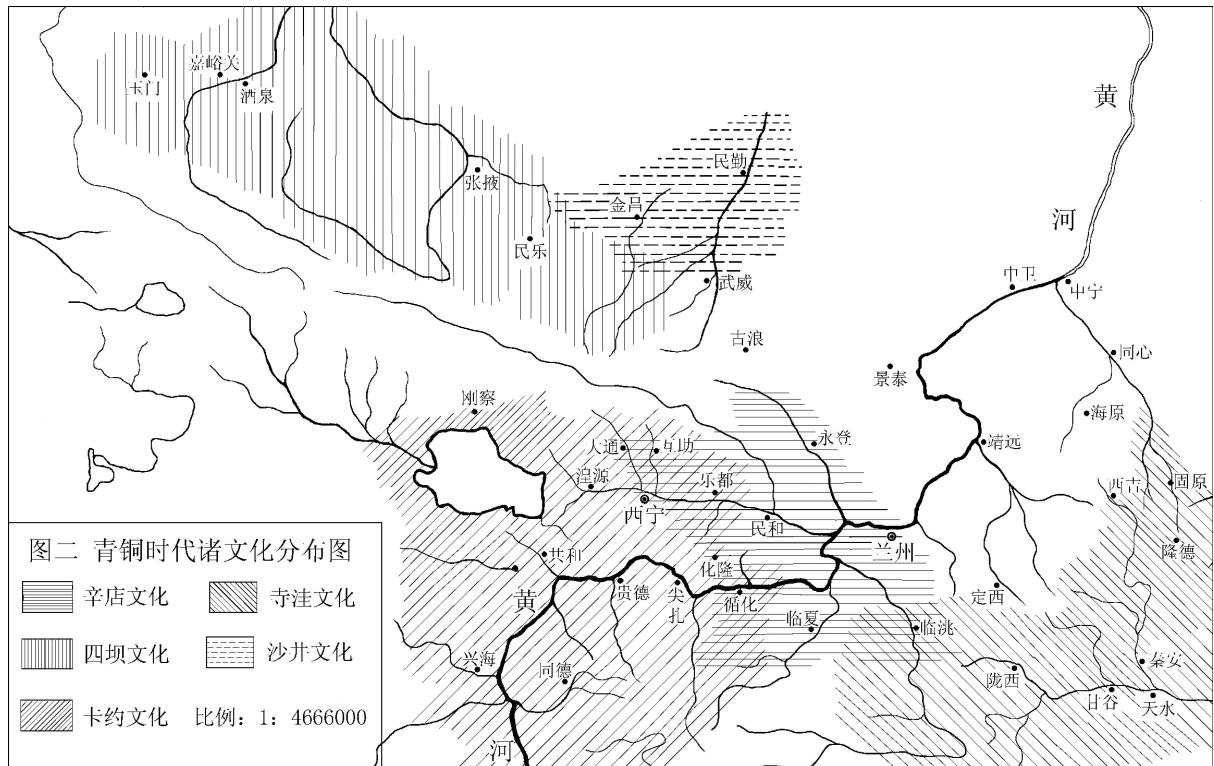
着,马厂时期就有了东区与西区的划分^[57],甚至东区还分出了兰州市和柳湾区^[58]。陶器能够反映一批人,也就是使用陶器的人群;墓葬也能反映一批人,即拥有某种葬俗的人群。这两种反映不是同一层面的,前者是生产消费方面,后者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方面。两种客观反应很可能并不重合,但是葬俗方面的反映无疑更接近于人们的族群。因为环境的限制会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接近,生活用品也就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而思想观念则是很少受到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方式的约束,所以能够有着明确的区分。这样的例子在多民族集聚区普遍存在,我们在青海东部地区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多个村庄都是汉族、回族、藏族混杂的,生活方式基本一致,区别只是在于婚丧嫁娶等方面,尽管生活用具的差别不大,可是每个人对于自己属于什么民族都很在意,这就是心理认同形式的明确性了。如果我们把葬式的选择理解为一个人们群体的心理认同形式的话,就能看出有如下所述的变迁过程。

庙底沟类型之前没有发现农业文化,但是不表明该地区就没有人群活动,青海贵南拉乙亥发现过距今 6745 年的细石器遗存就是证明。庙底沟类型的遗物属于仰韶文化,是不是东部过来的移民留下来的尚不敢说。马家窑类型在陶器上已经具备了与东部地区分庭抗礼的独自特征,或许就是东西部文化融合的产物。这时期葬式上出现了一个俯身葬区域,并且恰好在马家窑类型遗存分布最边缘的青海同德宗日,很难以外来移民解释,只能说最大可能是当地人群接受了东部的农业和陶器制作技术。进入半山 - 马厂时期,甘青文化圈自己的特征凸现出来,陶器

发展与东部截然不同,葬式上更是特点鲜明,形成了俯身葬、仰身葬、屈肢葬三个比较明显的分布区,结合陶器的地方特色,或许仰身直肢葬还应该分解为河西与湟水两个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一时期也是农业文化大发展时期,表现为遗址数量剧增,可以理解为当地的各个人群逐渐接受了农业经济并成为这一地区农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外来的移民被基本同化,因此在葬式上就显现出了自己的族群特征,分别占据兰州地区、青海黄河两岸、青海湟水谷地和甘肃河西地区。

目前齐家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起源和地方类型尚不清晰。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一下子覆盖了极为广阔的地区,必有深层的原因在里面。自然环境或许是一个应该想到的因素,齐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青藏高原也与世界范围内开始的气温下降同步^[59],联想到整个欧亚大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齐家期的动荡也就好理解了。我们看到俯身葬区依然维持着,只是这里的齐家文化与其他地区是否文化面貌上也一样,还限于资料不能得知。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屈肢葬区的消失,半山-马厂时期屈肢葬区的继承者永靖秦魏家和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墓葬,仰身直肢葬取得了优势,留存下来的屈肢葬,一部分表现为仰身直肢葬男性的附庸甚至是殉葬者,另一部分也就是单人屈肢葬也是很少随葬品,例如前面所说的大何庄的情况。单人屈肢葬与合葬墓中的屈肢殉葬者结合来看,显然这是一个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体。因此笔者认为齐家文化合葬墓反应的与其说是男尊女卑,不如说是族群征服。被征服的屈肢葬人群或许一部分迁徙(到了河西和湟水中游,

黄娘娘台和柳湾的屈肢葬数量增加了,但是一样受到奴役)、一部分改变了原来的葬俗而融合入征服者人群中、一部分就是我们见到的保留了自己屈肢葬特色的被奴役群体。那么作为征服者的仰身直肢葬群体是哪里来的呢?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西面湟水谷地和河西地区的仰身直肢葬群体,一是东面陇东地区仰身直肢葬群体。前者的话有气候变化的因素支持,也就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本身就是一个气候变化敏感带,轻微的气候变化在内地还没有反应的时候,这里就有了进退的表现。气温下降使得农业文化东退,侵占了屈肢葬地区;若是后者的话则有考古学遗物的支持,目前为止年代较早的齐家文化出现在东部^[60],也是一支逐步西侵的遗存,对于屈肢葬群体实施了征服占领,对湟水谷地和河西地区的仰身直肢葬群体实施了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地区依然保留了一些原来的特征,例如柳湾墓地马厂与齐家墓葬最初器物很接近,齐家的面貌是逐步代替马厂的,显然族体没有变化而仅仅是陶器上的替代。对于更远的俯身葬人群,仅仅是因为有了典型的齐家文化双大耳罐才定性为齐家文化,具体面貌还不清楚,有待于资料的发表,或许与宗日遗址一样还有一些自己的器物群也未可知。而河西西部地区则顶住了齐家的侵袭,由马厂类型过渡到了四坝文化^[61]。基于目前资料,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也就是齐家文化由东向西发展,在陶器上取代马厂类型而覆盖了除河西西部以外的甘青文化区的大部,而在人群上仅仅是征服并占领了最东面的以屈肢葬为表征的族体,其余地区仍是原来人群的继续。这时期与半山-马厂时期一样有四个群体,只是人群构成稍有变化:东区一个是外来的仰身直肢葬人群及其统治下



图二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分布区域

的屈肢葬人群的混合群体,西区南部依然属于使用俯身葬的比较单纯的群体,西区中部湟水地区是融入了少量屈肢葬人群的仰身直肢葬的群体,西区北部河西地区是接受了部分外来屈肢葬人群的仰身直肢葬群体。

青铜时代仰身直肢葬覆盖了整个地区,但是陶器反应的考古学文化则分化为若干支,看这几支文化的分布,其与半山 - 马厂时期葬式区的关系竟然显得遥相呼应:俯身葬区与湟水流域的仰身直肢葬区合并为卡约文化;屈肢葬区与辛店文化大致重合;河西仰身直肢葬区成为了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屈肢葬区以外的甘肃地区取代齐家文化的是寺洼文化(图二: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的分布区域)。由此似乎可以理解该时期的族群特征在陶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气候变化导

致俯身葬区的经济类型转化为畜牧业,湟水流域的仰身直肢葬人群也同时有此转换,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共同具备的游动性特点,使得俯身葬的人群与湟水流域仰身直肢葬的人群迅速融合,尽管俯身葬不是主要的葬式了,可是仍然零散的出现并作为卡约文化葬俗的一个特色长期存在下来。辛店文化毕竟没有大量的屈肢葬存在,但是临夏莲花台墓地达到了 12%,民和核桃庄墓地也有 4 例,隐隐透露出其中的联系,或许是经过齐家仰身直肢葬人群长期统治后埋葬习俗被基本改变了,可是作为族群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再次复兴起来。河西地区的人群依然保持了其固有的仰身直肢葬习俗。寺洼文化人群可能是真正的齐家文化人群的继承者,其分布的东界也超出了半山 - 马厂的范围,几与齐家文化相

比,就是一个佐证吧。不过文化面貌上,齐家文化之后的几个考古学文化,似乎在陶器制造上出现了极大的退步,并且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消失了,有无可能不像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族群延续,而是反映了人群的更换?对于卡约文化的陶器退化,俞伟超先生曾经做过解释:畜牧部落的流动性,大大超过农业部落,所以其陶器等生活用品,一般讲不会像农业部落那么精致^[62];况且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陶器生产已经不一定就是最高生产力的代表,不是衡量先进与否的标准了。至于社会分化的消失,也要考虑之前的分化属于什么性质,我们看齐家文化的殉葬以及贫富差距,更多体现在族体之间的征服与压迫,而不是本族体内部的等级划分,因为仰身直肢葬之间还没有很多阶层分化的证据(有无殉葬者或许是一个这方面的证据)。这个问题还需要以后继续探讨。

五 余论

有一批资料值得关注,这就是宁夏南部和甘肃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代表性遗址是宁夏固原店河墓地^[63]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64]。陶器上看,泥质陶的彩陶几乎就与半山陶器毫无区别,夹砂陶则是齐家文化常见的斜篮纹,基本不见马家窑文化的绳纹,器形、器类也是齐家文化的传统。所以有人称之为半山遗存,有人主张是齐家文化,还有人觉得应该单独命名一个文化^[65]。文化归属尚有待于讨论,可是其埋葬习俗需要分析:固原店河墓地全是侧身屈肢葬,海原菜园村切刀把墓地凡是可以辨认葬式者也全是屈肢葬,尽管有仰身、俯身、侧身之分,这一点与兰州为中心的屈肢葬区是一致的。笔者曾经分析过甘青地区的二次扰乱葬习俗^[66],

该地区恰好也是位于二次扰乱葬分布区的东部边缘,那么有理由相信在大的人群划分上这里是在甘青文化区之内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前面所划出来的屈肢葬区范围扩大到这一地区了。虽然陶器显示了较多的齐家文化特征(或属于常山下层文化^[67]),考虑到这里的齐家文化或许早于西部的同类遗存,所以暂定这是半山-马厂时期屈肢葬区的东区。在人群上这里与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仰身直肢葬也是不一样的,真正齐家文化扩张时期也被仰身直肢葬人群征服占领,到了青铜时代才再次显露出自己的特色,甘肃合水九站寺洼文化墓地的4例屈肢葬就是迹象。更为重要的是,秦人墓葬中的屈肢葬传统,或许源头就在这里。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屈肢葬,赵化成先生认定其为西周时期的秦人墓葬^[68],就是原先屈肢葬传统的人群的复兴吧。俞伟超先生就指出过洞室墓、屈肢葬是甘青文化带给关中地区的影响^[69]。

参考文献

- [1]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6期。
- [2]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乐都县脑庄发现马家窑类型墓》,《考古》1981年6期。
- [3] 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9期。
- [4] 据参加发掘的李国林先生见告,在此表示真诚谢意。
- [5] 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5期。
- [6] 宗日遗址发掘资料,现正由笔者整理编写报告,本文使用了一些尚未发表的统计数据。
- [7] 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2期。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 [8] 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2期。
- [9] 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康乐县边家林新石器时代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4期。
- [10]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2期。
- [11]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
- [1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马牌马厂类型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 [13]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2期。
- [14]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考古学报》1994年4期。
- [1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6]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 [17] 卢耀光:《循化西滩半山类型墓葬清理简报》,《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5期,1983年。
- [18] 李梅菊、孙小妹:《尖扎县直岗拉卡乡砂料场半山墓发掘简报》,《青海文物》总第七期,1992年。
- [19]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 [20]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青冈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二),1982年。
-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蒲朝缓:《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马厂类型墓葬》,《考古与文物》1995年3期。
- [22]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6期。
-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 [2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 [2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黄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 [26]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 [27]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订正》,《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 [28] 报告中记录有22座葬式不明或无人骨架,但是分类时候却将之归入单人墓葬中,我们只能按单人统计。
- [29] 转引自谢端瑞:《略论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 [3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王占奎等:《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 [3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6期。
- [32]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1987年8期。
- [33]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订正》,《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 [3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2期。
- [35]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2期。
- [36]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3期。
- [37]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东乡崖头辛店文化墓葬清理记》,《文物》1981年4期。
- [38]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嘴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 [39] 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
- [40] 许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处探》,《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
- [41]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考古学报》1994年4期。
- [42]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2期。

- [43] 窦旭耀:《化隆县下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青海文物》总第八期,1994年。
- [44]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 [4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2期。
- [46] 《我省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青海日报》1978年2月18日。
- [47] 谢端琚:《略论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 [48] 青海同德宗日墓地有近百座没有随葬陶器的墓葬,从其墓口处一层灰烬、流行侧室偏洞墓穴等特点来看,应该是卡约文化墓葬。
- [49] 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 [50] 高东陆、吴平:《青海境内的石棺葬》,《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6期。
- [51] 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52] 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5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 [54]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5期。
- [5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 [56]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
- [57] 袁靖:《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58] 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 [59] 王富葆:《一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初步研究》,《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2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
- [60]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1期、2期。
- [61]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 [62]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
- [6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8期。
- [6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
- [6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4期。
- [66] 陈洪海:《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二次扰乱葬辨析》,《考古》2006年1期。
- [67] 胡谦盈:《论常山下层文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68] 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 [69]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1期。
(原载《古代文明》(辑刊)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陈洪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教授)

《摩石录》序及后记

《摩石录》序一

何寄澎(台大中文系名誉教授)

近一、二十年因着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需要，我多次赴大陆著名大学访问，也几乎定期参加唐代学会、宋代学会，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因而得识大陆中文学界的诸多俊彦，其中有些亦成为君子之交的朋友，对这样的缘分，我个人是极为珍惜的。在这些学界俊彦中，李浩先生相对沉静而内敛，虽蒙其赠我大作若干，但彼此交谈不多，算不上熟识，我从他的著作知道他研究杰出、成果丰硕，心中始终是佩服的。

去年(2019)秋，李先生来台客座，因而有机会小聚，知其已撰就《摩石录》诸稿，当下叹服不已。盖金石之学，牵涉的知识太广，需要的涵养太深，李先生写来旁征博引，井然有见，虽初试啼声，功力已然不凡。各篇所涉课题包括：唐初乐律学，唐初政争，士族转型，贵族女性崇道、崇佛风气，中唐以后石刻技艺的集团化、家族化，以及唐代与域外异族的交涉等等。各篇或补史之不足，或拓学术新视角，或揭一己独特新见解，而莫不裨益学术，诚有足多者！阅读上述诸篇大作时，我个人虽不能赞一辞，却勾起久远的记忆。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浏览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便爱不忍释，动念他日当就此深入研究。然因生性疏懒、专精不足，

始终不敢纵身其中，仅于偷闲之时，反复翻阅以为餍足而已。有关《集古录》，欧公虽说：“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目序》)但我个人总觉得对自我生命、对他人生，乃至对历史、现实一以贯之的关切与深情，才是欧公对金石遗文怀抱无限热情的关键。试看《后汉杨震碑阴题名》曰：“……汉隶世所难得，幸而在者，多残灭不完，独此碑刻画完具，而隶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显示的是日常生活的爱悦与适意。《唐湖州石记》曰：“(颜鲁)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显示的是对颜鲁公人格、气节的崇拜。《魏公卿上尊号表》曰：“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从“未知孰是”的知性辨证到“可为之流涕”、“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的感慨与凛然，显示了欧公对历史正变、是非的关怀。《唐韩覃幽林思》曰：“右《幽林思》，庐山林薮人韩覃撰。余为西京留守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余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

得之，不胜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山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六月旬休日书”。字里行间，死生无常、际遇难料、人事多变之感慨，充然在目。《唐华岳题名》则在人世百端之外，尤深致叹惋于“世变多故”，其文曰：“开元二十三年丙午，是岁天子耕籍田，释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立，盖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五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

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在对人命终归澌尽泯灭而已的感叹中，尤透露出一己对治乱盛衰有常无常的惑与不惑。要言之，从上引诸篇《集古录跋尾》，固可见在“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的核心旨意之外，欧公更藉此表现其兼涵“小我”、“大我”的抒情咏叹，而后人正由此可窥见欧公动人的内在情怀以及笔下特殊的文字风格。我因此想到，李先生的石学研究，何妨在庄严的学术层面之外，渐渐添入个人浸淫此种种史料当中的所思所感、所体所悟？则或许因之别开李先生另一新胜场，亦未可知。书名《摩石录》，我个人反复揣想，莫非其中亦已有如欧公嗜好、把玩的心情与趣味在？则李先生对我上述的发想，何妨兴乎而为此。但愿不久之后能见到《摩石录跋尾》这样的书写，是为盼！

何寄澎 敬识

2020.7.29 于台北酷暑天

《摩石录》序二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李浩教授结集近年所撰有关唐代石刻研究论文十多篇，题曰《摩石录》，将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嘱我为序，不敢辞，谨述初读感受，与读者分享。

近年与李浩教授来往频繁，他主办会议我多曾参加，我这边的事情也不免叨扰于他，有这样的机缘，本书中半数文章，先前就曾阅读，时有所获。比如李百药墓志，即从他这里初见，我恰

在编订唐诗，李百药为初唐名家，立即据以增写小传，补充事迹。再如回纥公主墓志与双语之安优婆姨墓志，我难以发表所见，而国内外治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之学者对此抱有极大兴趣，我有认识的朋友，也曾为之联络绍介。当然，最近的几篇，都是首次见到，内容重要，考释精微，值得作特别的介绍。

一是初唐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大约是郑译墓志发表后，有关隋唐音乐史最重要的发现。两《唐书》皆有祖孝孙传，稍显简略。有关祖氏家世、生卒及家学传授部分，墓志可以补充史书的内容很丰富。李浩教授研究的重心在于祖氏家学传授的部分，涉及南朝祖冲之家族，北齐祖莹家族，以及南北分治时期祖氏家族的发展梗概。就祖孝孙本人师承来说，则除家学外，还得益于向陈阳山太守毛爽及梁博士沉重学习京房律法。集中这些优势，祖孝孙先后参加开皇乐议与贞观乐议，为唐雅乐完成做出重要贡献，就可以理解了。李文有一节讨论祖孝孙的乐律学贡献，我不完全理解，但说墓志丰富了史籍的记录，应该可以肯定。

二是《冯五娘墓志》。此志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褚遂良的早年所撰所书。遂良是南方人，隋时随父漂泊，曾归陇西薛举，降唐后很长时间并不受重用。此志撰于贞观十二年，遂良已四十三岁，官起居郎。手边未检得他的年谱，凭印象似乎是他最早的书迹，弥足珍贵。冯五娘是北魏外戚名家冯氏后人，更重要的是隋唐间名将薛世雄的嫡妻，对冯、薛两家之谱系与薛世雄在与窦建德军作战时败亡的隐情，李浩教授已作详尽考释，很是精彩。我更感兴趣的是此墓志对薛世雄死后，冯五娘维持此一家族发展，将薛氏诸子培养成人的记录。李文征引及这一家族已经发表的多方墓志，其中薛万备墓志我先前也曾撰文提到（见《齐运通先生编选〈新志百品〉初阅述感》），而薛万述及其子薛玄育墓志，则前此没有注意（二志似在民间私人收藏），这些墓志放在一起阅读，立体地展现关陇名家一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许多细节都是正史没有载及的。众所周知，薛万彻卷入高阳公主案而遭诛，此事件

对这一家族有怎样的影响，本书提供的丰富文献有充分展示。《冯五娘墓志》是一篇孤立的贵妇传记，独立阅读也有其价值，放在历史过程的大背景下阐释，对比相关文献来阅读，孤立的传记就丰富而立体的站了起来。李浩教授做了认真的诠释，使我得到阅读的愉快，更增读史之沧桑之慨。

三是《李堪妻宗氏墓志铭》。仅就志文说，此志是旧相之女嫁给宗室之子的人生记录，并不涉及复杂的史事。李浩教授的研究则发现一特殊的视角，该女与大诗人李白妻宗氏来自同一个家庭。宗氏之父宗楚客，虽也出身北魏以来的世家，本人也曾进士及第，但在武周时期，凭借其母是武后从父姊，从神功到景龙十多年间，三度入相，权重一时。唐隆政变，宗氏兄弟被杀，此一家族迅速衰歇。此墓志及李浩教授的释读，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家族在漫长的玄宗时代如何渡过，他们该如何叙述先人曾经辉煌但在现实政治中又几乎被否定的这段往事。李浩教授仔细还原了这一家族的兴衰史，特别是通过对墓志中借典故辞章修饰起来的晦涩文本，作了准确解读。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墓志对家族往事之叙述，居然与李白给妻弟宗璟诗中对宗家中落的评述，有惊人的相似。李浩认为墓志在前，那也可能李白见过此方志文。这一诠释，对释解李白诗也有意义。

四是《邵建和墓志》。志主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内廷御用刻石匠人，且几乎是柳公权书法的专属刻匠。就中国传统的社会尊卑来说，刻工地位很低，但从西方艺术史来说，雕刻匠可以成为伟大艺术家。不久前刚看电影《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大教堂作顶棚设计的米氏，就是一位伟大的匠人。邵建和在唐代石工中，无疑处于最顶尖的位置，因此他在身后，留下一行“故中书省镌字官题玉间都勾当刻玉

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的官衔,所谓玉册,专指皇家丧葬及封册的文告,他因此而得到崇高认可。墓志说:“当敬文之际,郊天祀地,旌善纪功,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铭,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由是声价弥高,劳绩兼着矣。”这是唐代艺术史极其重要的记录,今人知道柳公权,更要知道邵建和。墓志还有一段:“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这是唐初以来最著名石刻工匠的名单,应该是当时业内的共识。李浩教授已经就所知对数人加以考释,我相信仍不全,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

唐代墓志研究是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外唐代文史研究中的显学,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新发表文献数量巨大,大约数倍于宋以来千年之总和;二是继武传统,重视个案研究,将传统以题跋为主的文本诠释,变为现代学术论文的发表,以石刻与存世文献比读,以求抉发新见石刻之价值;三是方法求新,立场变化,采取系统统计、文本深读、现代诠释乃至社会学研究等诸多新路,开拓学术新域。当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许多,从文本来源说,则民间盗掘已成公害,从文献发表说,重影印而多有重复,从研究实绩说,则发表多而开掘不深,铺排堆砌,缺乏通贯的考察与问题意识。当然年轻一代的崛起,也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值得我们抱持殷切的期待。

至于李浩教授本书的成就,我不拟作特别的拔高,只想作客观中道的介绍。我想特别提出,李浩教授本人是陕北靖边人,在古都西安学习工作超过四十年,于汉唐文化与文学用力甚勤,根底亦好。他在本书所据墓志,完全来源于老友齐志先生

主持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与他书已经发表者几无互见。我于近年以洛阳、西安已发表墓志浏览近于周遍,对此感觉很清晰。榆阳区在陕西最北端,在唐代属于银、绥、夏诸州,接近边地,是民族混居之地。本书中的民族墓志,即与此有关。李浩教授与齐志先生的合作已接近十年,今年初我曾到西安参加以该馆石刻为研究课题的专题讨论会,了解有关收藏之丰富与研究之深入。该馆全部藏石将另刊布,值得期待。就李浩教授本书各文之研究方法言,我特别欣赏他的坚守传统,穷尽文献,拓宽视阈,不循一格,因此而能言之成说,多有发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自成家数。

写到这里,我想到以前曾经引用过的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三五年谱)我不知道李浩教授是否关注过这段话,但他的工作,与前辈的倡导无疑是精神相通的。就如同绩学如章太炎,始终排斥新见的上古文字,今日拒绝或不重视新见文献学者还不在少数,包括年轻一些的学者。我愿意更借此指出,新晋学者的治学,必须更多地关注新见的文献与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终难预流。

与李浩教授认识超过三十年了吧!最初是治唐的同道,后来他曾来复旦做过一段博士后研究,此后一直对我很客气。从2008年开始,我忝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他则以副会长兼任秘书长,负责学会的日常运转,因此得有更多的合作。我感觉他是踏实而谨守分际的君子,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考虑问题周到严密,凡事能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

之得失,承担责任,任劳任怨,学会工作运转正常,他的功劳最大。最近十年,老成雕零,风气遽变,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存续传统,正常运作,维持风气,追求新变,其实很不容易。我的能力与资源都很有限,但一路顺利,心情愉快,其实我心里明白,是与得到包括李浩教授在内的众多同仁的理解支持分不开的。去年曾得机缘讨论学会今后的

发展与人事调整,很难得的是看似复杂的问题,开诚讨论后大家都很愉快。我也借此机会记述这段过程,表达存于心中而难以口述的感谢。

时疫方殷,世事不靖,凡百君子,各自珍重。
谨此为序。

2020年8月9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摩石录》后记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江学者)

写作本书的缘由我在代前言中已经简单交待。若要补充,就是写作时间与我过去几本书不太一样。此前的几部个人著作,在写作时我都是如狮子搏兔,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完成后就撇开不管了。本书则耗费了我多年的时间,如魔鬼附身,念兹在兹,摆脱不掉。

从撰写关于《李百药墓志铭》的第一篇文章,到为后记敲下最后一个键,已经过了六七年时间。之所以如此拖沓,主要是我的慵懒。因为每篇首先写成单独论文,小范围征求意见,再到会议上宣读,然后交刊物发表,每一篇都要走一个类似的程序。起始,我是将此题目当作一个系列论文来写的,并没有结集出版的念头。直到最近,才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希望能更大范围征求意见,于是仓促间集中整理,统一体例,赶着未完成的活。

另外要说明的是,收入本集的虽仅仅是十多方石刻新文献的整理成果,但对我个人来说,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很大。我是学中干,干中学。因为我的学术专攻主要是唐代文学,是以对传世的经典

文学做阐释为主要任务的。整理石刻文献除了要认字外,更大的难度是,许多新出文献与文学毫无关系,在两《唐书》等史书中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还有不少“塞表殊族”人物,从现代民族学来看,既有境内民族,又有跨境民族,还有境外民族。当然,从历史学来看,都属于古代民族,有些已经消失,或者与其他民族融合。还有,我过去对宗教学的知识有限,现在则马上要处理唐代异族女性修持者、唐代外族女性与佛教三阶教有关的案例等。此外,新文献还涉及书法史、刻石工艺学、甚至古代乐律学的旋宫法等等。早年学的那点三脚猫功夫都派不上用场,只能病急乱投医,急用先学。虽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从传统做学问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也不认可这种速效的恶补。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将此项目作为一种自我测试和自我挑战,对自己的年龄、身体、反应以及心身协调能力的测验。看看年近六旬的半老人,是否还能有跨学科的视野,是否仍然能吸收专业以外的新知,是否能每天静坐下来,进行长

时段高强度的工作。当然,更深一层但又有些羞于告人的目的是,我将此项工作作为抵抗阿氏海默症、帕金森症等衰老病症的一记良方。在衰老的黑暗降临前,做一些预防和抵抗,也把所要做的事赶出来,少留一点遗憾。事实证明,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抵抗衰老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最后是致谢。我与齐志兄、苗丰兄是发小,在陕北张家畔度过了属于我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及长,却各奔东西,渐行渐远。无论作品内容、工作地点都不搭界。但在我快 60 岁时,为保存故籍神皋,我们又重聚首,有机会再合作一次。我们是在砸烂封资修的极端时代野蛮成长起来的,但在五十年后,却能将飘零散佚的片石汇集起来,移交国家,建博物馆保存。一起一落,大破大立,大开大合,历史车轮的大震荡,个体机运的大转捩,我们不可能是大时代的操盘手,但却是这几十年来光怪陆离现状的亲历者。个中况味,艰难苦恨,只能体验,无法言说。

收入本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还记得刘跃进兄听说有《北齐书》作者李百药的墓志,特别期待,嘱张剑兄特稿特办,很快刊发。陈尚君先生看到我关于回纥贵族两方墓志整理的初稿,提了很好的建议,并立即推荐给《唐研究》。此后我们搞的新出文献整理研究的系列活动,都有尚君先生的身影。胡戟先生在西大时给我讲过《资治通鉴》,此后他虽然离开西大,但对老学生还是时时照顾。荣新江先生成名甚早,但儒雅谦逊,凡是叫他审阅的稿件,都能认真校改,做了好事不留名。周伟洲先生是与我读研究生时同一寝室的苗普生兄、杨铭兄的授业师,我也一直视他为老师,故我将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释读的稿件呈交周老师指正,周老师提了很具体的意见,惜稿件已交期刊社,

发表前的修改不彻底,收入本书时,又调出周老师的邮件,做了尽可能的吸收。葛承雍兄是我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老同学,我们虽然学术专攻不同,但他一直是我学术上的畏友,从他的学术转向和学术新成果中,我获得了许多启示。当然,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恕不能再唠叨罗列了。

我的几位学生王伟、胡永杰、樊文军、万德敬、亓娟莉、李波、罗曼等帮我校订稿件,做了大量工作,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是近四十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亲历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很早就结识了罗联添、何寄澎、叶国良、龚鹏程、廖美玉、萧丽华、吕正惠、简锦松、王明荪、宋德熹、李纪祥、曹淑娟、侯乃慧、林淑贞、李宝玲等几代师友。特别是 2014 年、2019 年先后在逢甲及中兴执教,与何寄澎、廖美玉、林淑贞、宋德熹、李宝玲诸位不时请教,过从甚多。

几年前,利用在逢甲工作的机会,我还曾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拜访过胡金伦先生,惜返回大陆后,原来的设想未能完成。故这一次书稿甫成,我首先想到呈交胡金伦先生,由他邀请专家审读,不期金伦兄转到时报出版高就,故本书的具体编辑工作仰赖陈逸华总编负责。

我愿将本书的初版交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刊布,除了是对此前在逢甲、中兴两所学校的师友致敬,也希望能第一时间得到两岸三地同好的剖析批评和指正,同时呼吁海内外从事传统文史学科的新生代朋友,能更多关注新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俾使丰饶的中华文化研究与时俱进,光景常新。

2020年2月24日农历庚子年2月2日,
俗谓龙抬头也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9月，为无行政级别的实体研究机构，现任院长为李利安教授。2015年11月28日在“玄奘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在中外100余位学者的共同见证下，由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陕西省总工会主席白阿莹、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副司长薛树琪、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共同为玄奘研究院揭牌。这是国内第一家以玄奘命名的研究院，从此，儒家有以孔子命名的研究和文化传播机构，如孔子学院；道家有以老子命名的研究机构，如老子研究院；佛教文化领域也有了以旗帜性人物命名的研究机构。

玄奘研究院以历史学院宗教文化教研室科研人员为主，联合校内各院、系、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形成学科交叉、梯队合理的研究力量。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2人、讲师3人。机构宗旨是研究以玄奘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包括佛教历史、佛教哲学、佛教信仰、佛教艺术、佛教文学、佛教民俗以及佛教人物、佛教寺院、佛教经典等一切与佛教文化相关的领域，同时研究佛教与社会、佛教与经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等。此外，推动交叉学科研究，形成宗教学与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团队成员及研究成果成为学校申报哲学一级学科（宗教学方向）博士点的完全支撑材料。

玄奘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如主持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宋元明清时期汉地观音信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隋唐以前禅法研究”、“清代南部县宗教与乡土社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佛教生命关怀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视角的佛教临终关怀研究”“南北朝禅学研究”“宋代民间观音信仰研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魏两晋佛教编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级子项目“观音信仰与中国社会”，中央统战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宗教在西部大开发中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研究”，陕西省宗教志编写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陕西省政府专项科研项目“陕西省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大藏经点校工程”（作为编委之一主持其中的部分校点与编审工作）。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光明日报》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总计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研究》《佛教菩萨观》《金刚经般若思想初探》《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南北朝佛教编年》《弥勒信仰研究》《佛教死亡观》《丝路高僧传》《终南法脉》《终南古刹》《终南高僧》《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等30多部，主编《论藏名著选编》（已出版25册）《终南山文化丛书》（6册）《中

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8册)。

近年来,该机构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持续展开学术研究:

1. 佛教信仰史研究

已建立起佛教信仰史的研究体系,相关成果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汉地的观音信仰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民间观音信仰研究”,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四大名山信仰研究”,出版《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弥勒信仰研究》《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研究》《佛教菩萨观》等,发表佛教信仰史研究论文40多篇,其中在顶级刊物《哲学研究》发表《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在权威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明末清初太兴山真武信仰探析》《汉传佛教四大菩萨及其应化道场演变考述》,另外指导博士学位论文中有近10篇为佛教信仰问题研究。

2.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研究

完成《世界佛教通史》第三卷的南北朝佛教部分,共33万字(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及北京市政府特等奖),完成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南北朝佛教编年》共80万字,获陕西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两汉魏晋佛教编年》也已经形成50万字书稿,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之中。另外,发表有关本主题的论文十多篇,指导博士论文《鸠摩罗什入华弘法研究》及多篇硕士论文也与此主题直接相关。

3. 佛教现状研究,尤其是当代人间佛教与陕西当地佛教文化资源研究

关于人间佛教研究,除在顶级期刊《哲学研

究》发表《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外,还发表人间佛教研究论文30多篇,主办“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论坛”。关于地方佛教文化资源研究,在权威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太兴山民间宗教调查研究》,《明末清初太兴山真武信仰探析》,出版《终南山文化丛书》(6册)《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8册)(其中六大宗派的祖庭在西安)《陕西省志·宗教志》等,丛书中由研究院成员完成的著作有12本。主持教育部项目《陕西教的历史与现状》,并在陕西主办、承办如“玄奘与丝绸之路”“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4. 宗教理论与宗教现实问题研究

主要集中在宗教本质、宗教形态、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西部宗教相关问题等方面。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完成最终成果《神圣的西部:西部宗教现实问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30多篇,其中在顶级期刊《哲学研究》发表《如何准确定义宗教》,在权威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和《从当代宗教的基本形态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个特性》,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西部宗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在《中国宗教》发表《中国西部地区宗教的共性特征》《宗教信仰对消费行为的十大影响》《宗教心理与社会和谐》《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领域和途径》,在《人文杂志》发表《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发表《当前世界宗教的基本动向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近年来,有关宗教现

实问题调研报告连续 3 次获得中央统战部三等奖,1 次二等奖。

另外,该院在佛教生死学、佛教文学、佛教义理、佛教戒律、中外佛教交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取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视角的佛教临终关怀研究”“隋唐以前禅法研究”,教育部委托项目“21 世纪以来印度佛教发展走向与佛教学术最新动态研究”等。在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在将菩萨信仰拓展到中国佛教信仰史的领域,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对陕西佛教文化的研究正处于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阶段,全面发掘整理历史资源、阐述当代价值发挥的途径,为陕西文化经济发展服务;佛教生死学、佛教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正在形成影响力,尤其是佛教生死学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临终关怀、佛教安养等问题在面对当代社会问题中将产生积极作用。

为促进国际化水平,该机构邀请印度、美国、日本等多国学者来讲学,并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日本等国进行学术考察、讲座交流。

2017 年主办“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论坛”,海峡两岸学者 100 余人参加;2018 年协办“‘一带一路’与多元宗教交往”学术研讨会;2018 和 2019 年连续策划并协办“雪窦山弥勒文化高峰论坛”,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举办 70 余场学术讲座以及不定期举行各种座谈会,举办 3 期“中国宗教研究”学术工作坊。

玄奘研究院还长期与省市统战部、宗教局及各大寺院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提供相关学术咨询、文化服务等。如负责人李利安教授担任陕西省统战理论智库专家,陕西省宗教工作专家,中央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与长安区宗教局签订合作协议,申报的“国际玄奘论坛”被列为中印建交 70 周年的纪念方案第六项重要活动。

玄奘研究院正在逐渐建立以中国佛教信仰史为特色的佛教史研究新范式;建立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完整体系,以期全面深入地论述其地位和价值;并在佛教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应对中,努力取得更大突破。总之,该机构在学科研究、建设陕西、服务社会中具有广阔的前景。



当代佛教专家——李利安



李利安，男，196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1980年入读西北大学，相继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宗教史专业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玄奘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辑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华诵经典读诵活动顾问，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省佛学院兼职教授，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特荣誉教授，忻州师范学院荣誉教授，陕西省政府宗教工作专家，陕西省委统战理论智库专家，西安市政协委员，长安区政协常委等。

李利安教授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独立出版学术著作10部，合著10多部，主编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含1项重点)、出版基金项目2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1项，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项。先后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颁发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中央统战部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优秀奖1项，政协西安市委员会优秀理论文章调研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李利安教授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尤其专精于佛教研究。近年来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信仰史、文明交往与佛教传播史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

完成《世界佛教通史》第三卷的南北朝佛教部分，对这个时期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及南北朝时期政教关系和各种佛教学派与佛教信仰的流行情况做了详细梳理和系统研究，对认识佛教传播与佛教本土化以及佛教发展的内在轨迹具有新的启示。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编年》，依年代排序，全面梳理史料，汇入大量造像题记与感应事迹等。另外，《两汉魏晋佛教编年》也已经形成80万字书稿，并获得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之中。

2. 佛教信仰史研究

李利安教授在信仰性佛教研究中最有建树的是观音信仰的研究，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和《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对观音信仰的基本结构、历史流变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并完成《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研究》《佛

教菩萨观》等专著 3 部约 80 万字,以及作为第一作者合著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的观音信仰部分,填补了国内观音信仰研究的空白。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时期汉地观音信仰研究”完成 120 万字的成果,已经提交结项。

3. 文明交往与佛教传播史研究

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相关的佛教传播研究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交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李利安教授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先后发表了《阿旃陀石窟:印度佛教历史变迁的缩影》和《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以及 2018 年 12 月在《新西部》发表的《丝绸之路视野下的玄奘精神与长安气象》,2014 年在《中国宗教》发表的《丝绸之路的精神资源》,都是对文明交往与佛教传播的研究,涉及丝绸之路的精神与及其当代启示等重要问题。同时也有通过具体历史事例对中印文明交往所进行的探究,如以西行取经僧、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三教关系等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开放的品格与佛教文化随缘圆融的个性具有重要意义。

4. 当代佛教研究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中国化、民间化两大历史阶段之后,自民国以来呈现出现代化的历史转变特征,其中以人间佛教为最鲜明的代表。李利安教授对这一历史转变的背景、特征、出路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发表《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当代人间佛教所面临的核心理论问题》《人间佛教的变与不变》《人间佛教与传统佛教的融和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等文,对人间佛教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反思,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另外,李利安教授结合当代佛教发展的新趋势,对佛教传统及其当代呈现,尤其是当代佛教的挑战与战略地位等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析,发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战略地位及其现代转型》《当代中国居士佛教的使命与挑战》《文化战略视野下的当代中国佛教》等文,分别探讨了佛教历史传统的形成及其同佛教现实之间的联系,揭示了当代佛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分析了佛教的战略地位与历史机遇。

5. 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李利安教授对宗教理论与宗教现实问题一直怀有浓厚兴趣。曾发表《如何准确定义宗教——兼与李申先生商榷》,全面总结了学术界几种主要的宗教定义,对宗教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在中国宗教学理论建构中具有一定影响。同时,以当代中国宗教为例,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形态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宗教构成的六要素说,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在《西部宗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中国西部地区宗教的共性特征》《中国式信仰的出路何在》等文中对西部宗教中国化的问题、西部宗教的特征、中国宗教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另外,李利安教授对当代宗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也做了学术性的思考,如发表《宗教信仰对消费行为的十大影响》,探讨宗教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论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提出对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一处罕见的民间宗教活化石——太兴山民间宗教调查研究》和《试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是对某些地区的宗教文化的具体研究,对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唐代文学专家——李芳民



李芳民，男，1963年5月生，陕西大荔人。无党派人士。1984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期留校工作。198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6月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及唐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唐诗与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韩愈研究会副秘书长、陕西省诗词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委员，在《文学遗产》《文史哲》《复旦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李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有《唐五代佛寺辑考》等。先后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及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1次）。又曾获西北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参与）、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参与）、二等奖（参与）等，数次被评为西北大学优秀教师，又曾被评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主持有校级、厅局级、省部级及社科重大招标子课题等科研项目数项。

李芳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以唐代文学研究为重心所在。长期以来，主要形成了以下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一、唐代作家与作品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李芳民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其重心之一。他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唐代为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唐代作家作品的考证与论析，一是关于有关唐代作家作品的注释。关于前者，其发表相关的研究论文约有二十多篇，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一些重要作家及作品做出新的考证、解读与论析。其中重要者有《张九龄“不协时宰”、“拂衣告归”考》《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李白“古乐府之学”臆解——围绕李白传授韦渠牟“古乐府之学”的断想》《“从璘入幕”罪案与李白暮年的冤愤》《李白暮年身世经历之自我记忆重构考论——以《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的相关记述为中心》《简论杜甫的山水诗》《岑参安西之行事迹新考》《论韩愈赠序文的创造性成就》《心灵世界与人格风范的映现——韩愈书启文论略》《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论语笔解〉出自韩愈国子讲稿臆考》《礼、法冲突与柳宗元的理性精神——以〈驳复仇议〉为中心的考察》《柳宗元释氏题材文类写作及其价值》《空间营构、创作场景与柳宗元的贬谪文学世界——以谪居永州时期的生活与创作为中心》《音乐境界与身世之感——李商隐〈锦瑟〉意旨再探》等。后者主要是参与有关唐代作家作品选本的笺注工作，其中主要者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参与)《中外文学名著导读》(副主编并参与)《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参与)《唐文选》(合撰)《中国传统节日诗词诵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分册主编)等。

二、宗教空间与文学的相关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唐代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的考证以其寺、观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展开。其中佛教寺院的考证成果，集中呈现于《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道观的考证，则主要为《唐人小说所见道教宫观考》等论文。寺观与文学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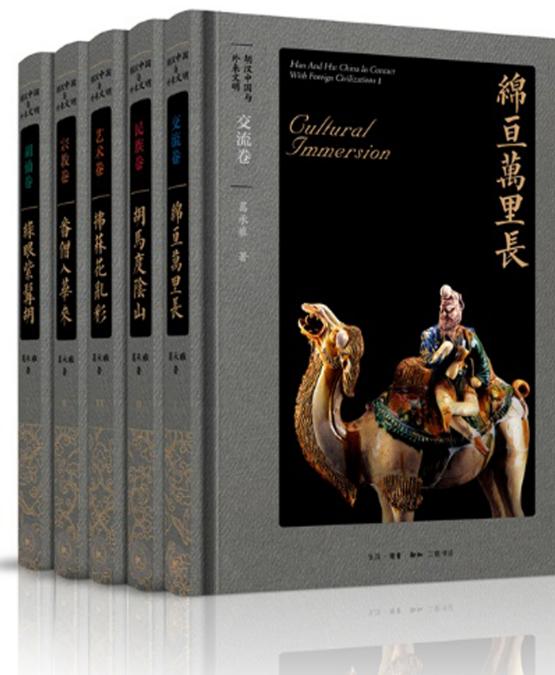
作的关系研究，也多以论文呈现为主，其主要者有《佛宫南院独游频——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探赜》《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红叶寺游诗兴多——唐长安的佛教寺院与诗歌创作》《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唐都长安的道观与诗人的诗歌创作》《长安佛寺及其文学记忆》《论唐代浙东的宗教空间与文学创作活动——以浙东佛教寺院与唐人诗歌创作为考察中心》《玄奘对唐代丝绸之路开拓的历史贡献——以〈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中心》等。唐代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作为宗教活动空间与场所，与文学的创作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界以往对此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李芳民教授围绕此一领域的研究，则多有开拓，故其研究成果也就受到了学界较大的关注。尤其是其《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首次对唐五代三百年间不同地区佛寺的创建、沿革以及地理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的考索与汇辑，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唐五代时期佛寺分布的历史面貌，展示了当时佛教传播流布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该成果出版后，国内学界多有褒评，同时也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关注，经作者及出版社授权，美国哈佛大学地理信息中心、加州伯克利分校以及亚利桑那大学宗教空间研究中心，曾以数据库形式在各自学校的研究机构网页发布该成果。

新书推介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承雍先生的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于2020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该书是葛承雍先生研究汉唐时期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和外来文明入华融合问题的重要学术成果的结集。其中《绵亘万里长》(交流卷)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专题,以考古新发现为先导,纳入中西文献的养料,采用“世界性”视野的思考观察,推出一系列别有路径的研究成果。《胡马度阴山》(民族卷)围绕“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主题,积极探索汉唐时期胡汉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从不同角度进行前沿性的研究。《拂菻花乱彩》(艺术卷)围绕“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专题,选择当今学术前沿的课题,按照文化遗产的流传线索,认真考察新近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以解读“人类瑰宝”的视觉心态和图像模式,展现出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古代艺术史。《番僧入华来》(宗教卷)围绕“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主题,对北朝隋唐时期各种宗教错综复杂的图景进行考察,针对由西亚、中亚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入华后的传播和变化,做了不同层次的研究,许多前沿性的课题被再次提出和重新解读,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绿眼紫髯胡》(胡俑卷)围绕“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专题,作者多年来深入考古现场和文物库房,考察各种浓缩世相的胡俑造型,拍摄了大量的精美图片,其中不仅有国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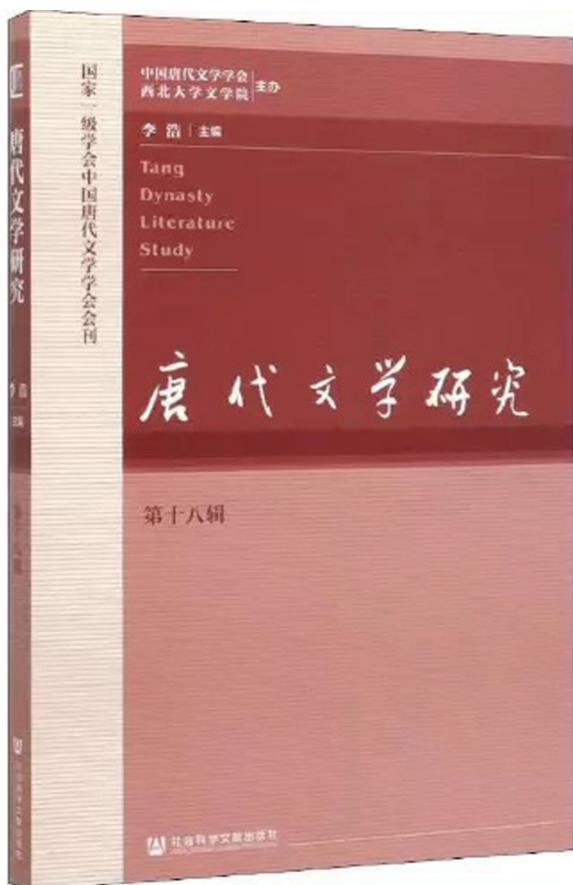


发现的陶俑、唐三彩,还有流失国外被博物馆收藏的珍品,它们印证了胡俑是文明交汇的记忆符号与灵魂标本。

此书一经推出,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赞誉。中国出版集团主要负责人评价说:作者20多年来始终坚持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开展对汉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互动问题研究。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代表中国学术界有关外来文明入华研究的最高水平,能够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名誉院长孙机先生认为,这部五卷本的文集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以文物和文献相印证,完成了一系列学术界为之瞩目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在时空坐标里闪耀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襟度,必将对后人有极大启迪。

◆《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八辑

《唐代文学研究》创刊于1981年,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由学会和西北大



学文学院共同主办。自2019年始,《唐代文学研究》的出版周期调整为每年两辑。《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八辑2019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辑主要选录了2018年8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的部分论文。围绕作家与作品研究、历史与文学研究、文献考辨、唐代文学的接受与传播研究四个主题,收录了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日本学者及美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共计16篇。这些文章或是将作家作品置于宏观语境下进行考察,从而提出新的思考;或是运用新材料、新思路对学界有争议或存疑的传统问题进行新的探究;或是着重于文本细读,并由此引发相关的新思考与新研究;或是探讨前人少有关注的作家及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问题。

全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也具有多元化特征,呈现了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界的新成果,富有学术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